



第 19 期（总 19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2015 年最新学科排名公布：北京大学 21 个学科位列全国第一	4
家·年华——北京大学 117 周年校友返校日喜迎中外校友回家	5
北京大学正式启动 12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	10
北京大学第 22 届体育文化节暨 2015 年田径运动会开幕	12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北京大学	13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采薇阁开园	16
读书最宜燕园春——图书馆举办“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18
全球创新论坛 2015 年会召开，以思想共鸣引领变革	20
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2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到访北大	23

■ 网教之声

“互联网+”能否助教育“飞”起来	27
未来五年影响高等教育的技术力量	29

■ 北大人物

张友仁：从昆明到北京	35
唐丽丽：医学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	42

■ 学者谈读书

从认真读好一卷书开始做起 ----- 49

且愚斋读书札记十则 ----- 52

■ 好文共赏

陶行知和他的“平民教育” ----- 57

■ 史苑钩沉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 65

■ 大美北大

燕园花事 黄月季 ----- 69

■ 学员心声

燕园抒怀 ----- 72

编辑寄语

5月3日，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燕园迎来了从五湖四海赶回家的校友。这些校友中，有毕业数十载、写下满满人生故事的皓首老者，也有刚刚离校二三载、怀揣青春梦想的年轻一代。有的校友与当年同窗结伴而来，回忆青春往事；也有校友带着自己的下一代，与母校同庆盛事。本期期刊选编校庆主题的新闻及文章和大家共庆5月。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吴晓风、李文文

■ 新闻动态

2015年最新学科排名公布：北京大学21个学科位列全国第一

4月29日，2015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发布。从整体情况来看，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美、英名校仍然占据了各学科顶尖名次的大多数席位，亚洲范围内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东京大学占据鳌头，新国大有11个学科排在全球前10，23个学科排在全球前20，东大有7个学科排在全球前10，12个学科排在全球前20。在中国高校中，北大、清华体现出明显的学科优势，其它有顶尖学科的大学包括同济大学（建筑学排名第16）和中国农业大学（材料科学排名第18）。

在全球学科排名前50中，北京大学共有22项学科入选，为大陆地区高校最多。相较于2014年，有6个学科在全球的排名上升明显——现代语言学从22名上升到5名，法学从51~100名上升到第18名，药剂与药理学从38名上升到22名，历史学从49名上升到30名，社会学从49名上升到33名，英语语言文学从51~100名上升到35名。

北大总体学科实力发展较为均衡，相比其他大陆高校呈现明显的“综合性大学”优势。北大进入前50名和前100名的学科数分别为22个和31个，分别占学科总数的61.1%和86.1%。

从国内情况来看，北大仍然具有绝对领先的学科优势。北大共有21个学科排名中国内地第一，远多于其他内地高校，其分别为：哲学，现代语言学，历史学，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药学，心理学，药剂与药理学，牙医学，物理学与天文学，数学，地球与海洋科学，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法学，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会计学与金融学，传媒学，商业与管理学。

2015年北京大学全国排名第一学科一览

学科	世界排名情况
现代语言学	5
语言学	14
化学	15
牙医学	17
法学	18
药剂与药理学	22

历史学	30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	32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	33
社会学	33
英语语言文学	35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	36
哲学	36
物理学与天文学	38
会计学金融学	38
地球与海洋科学	43
商业与管理学	43
数学	46
药学	51~100
心理学	51~100
传媒学	51~100

背景知识

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自 2004 年起与《泰晤士高等教育》合作发布世界大学排名，该排名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的世

界大学排名之一。2010 年，QS 与《泰晤士高等教育》停止合作，并各自发布世界大学排名。为了更加细致地反映各大学学科发展情况，从 2011 年开始，QS 在总体排名之外推出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以下简称“QS 学科排名”或“学科排名”）。

2015 年 QS 学科排名涉及艺术与人文、工程与技术、生命科学与药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等 5 个学科大类，共计 36 个学科（较去年增加 6 个学科）。QS 学科排名的指标体系包括学术声誉、雇主评价、论文平均引用率和 H 指数等 4 个指标。

来源：北大招生办

编辑：刘林

家·年华——北京大学117周年校友返校日喜迎中外校友回家

5月3日，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燕园迎来了从五湖四海赶回家的校友。这些校友中，有毕业数十载、写下满满人生故事的皓首老者，也有刚刚离校二载、怀揣青春梦想的年轻一代。有的校友与当年同窗结伴而来，回忆青春往事；也有校友带着自己的下一代，与母校同庆盛事。



邱德拔广场校友接待处



北大原校长许智宏院士、党委副书记叶静漪
与校友合影留念



老校友们留影纪念



北大人的一家三口



校友们与学位熊亲切合影

今年，北京大学校友会依然为校友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游园寻梦”带领校友故地重游，再寻青春；“怀旧瞬间”让校友们再次披上学位服，留影于燕园之中，重温学生时光；“文化之旅”使校友们重温北大记忆，感受人文情怀；“母校重聚”，老中青几代校友欢聚一堂，共叙同窗之情；“重返赛场”，羽毛球联谊赛、足球友谊赛等赛事热火朝天地举行。“燕缘”第二届校友返校

日摄影大赛也在火热进行，校友们用相机捕捉七彩燕园，用光影描述脉脉情深。



老年校友返校活动



怀旧瞬间



重返赛场——羽毛球联谊赛



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校友羽毛球俱乐部
会长谢杏芳与获奖选手合影



重返赛场——足球友谊赛

作为校庆的重要品牌活动，“游园寻梦”和“怀旧瞬间”继续受到广大校友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参与。校友们在总接待处领取“游园寻梦”活动手册，或换上学位服，重走燕园路，再忆未名情。集齐七个印章，就可以获得北京大学校友会为校友专门制作的礼物——由北大学子制作的手绘版校园地图拼图一件。再次披上学位服的校友们，留影于燕园之中，重温毕业时的庄严感与荣誉感，

也不忘记与本次“家·年华”的吉祥物学位熊一起合影留念。



“游园寻梦”接待处



集齐七枚印章

94级法学院博士王平校友，现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他九点半到校，一个半小时后已经完成了“游园寻梦”的全部“任务”。他对志愿者说：“每次回到母校都很激动，燕园的一切都在变得更加美好。祝福母校！”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图书馆前，和王平校友一样携亲朋好友共游燕园的北大人处处可见。他们与昔日同窗闲话曾经的学习生活，抑

或是静静坐在湖畔，微笑望向这湖光塔影，追忆那属于燕园的旧梦。



母校重聚，再忆青春

与往年相比，今年还新增了几项富有特色、贴近返校校友需求的新活动：斯坦福交流中心举办的“亲子诗会”，小朋友们深情投入地朗诵着一首首诗，献给多年前在燕园中行走的爸爸妈妈，也献给未来将在未名湖畔散步的自己。优美的音乐、深情的朗诵、欢畅的笑声，让燕园情在诗与乐中传递开来。最后，我们的小北大人和爸爸妈妈一起，为北大送上生日的祝福。



情意融融的“亲子诗会”现场

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也来到诗会现场，亲手画了一幅“动物园的诗会”简笔画送给小朋友们，并和大家一起切蛋糕吹蜡烛，祝福 117 岁的北大生日快乐。



吴志攀作画



动物园的诗会

“诗咏青春·归燕集”，这里有著名的校友诗人和我们读诗，有北大学生合唱团深情的演唱、舞蹈团曼妙的

舞姿、交响乐团激情澎湃的演奏，民乐团的曲声余音绕梁，朗诵主持团的诵读大气磅礴，歌剧艺术团带给校友深度的审美体验……百年北大，艺海馨香，有诗有远方。



诗咏青春现场



北大学生艺术总团校庆展演

下午三点，“青春万岁”首届草坪音乐节在一体正式开幕。在这场被称为学历最高的演唱会上，台上台下有几百个博士，几千个为青春热血澎湃的人。上台的演员里，有中科院的博导，有大三的本科生，有唱民谣的著名文艺女青年，还有教父级投资人，可谓“纵越三

十年，横跨学政商”。那些曾经在北大草坪上唱过歌的人，在母校校庆“除夕”重新聚首，将几代北大人几十年的青春记忆，全部汇集到同一个舞台上，一齐绽放。

除了“家·年华”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动外，返校日当天学校还安排了其他丰富多彩、富有纪念意义的专项活动。北京大学校史馆“书生本色 学者风范”系列专题展览推出“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以 160 余幅历史照片以及梁漱溟先生手迹、著作及生前所用之实物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梁漱溟先生不懈实践探索的一生。前 500 名来馆校友还凭着校友卡或返校日臂贴，登记领取了 2016 年北京大学校史台历一份。

校友们在尽情享受母校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的同时，也用各自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母校的热爱和敬意。很多校友利用返校时机积极参与捐赠，为母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校友会亦为捐赠校友奉上萌萌的“北学位熊”布偶一只，作为 117 周年校庆的特殊礼物。

当天下午，学校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等主要校领导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与百余位各界校友代表欢聚一堂，热情交流，共叙燕园情。在交流中，朱善璐特别提到，今年的 117 周年校庆日，也是学校正式启动 12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的日子；北大的目光永远不会离开校友，北大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校友的关怀和支持；祝福中国梦、北大梦早日实现，也祝福各位校友的梦想早日实现。林建华表示，面对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面对几代北大人的梦想，“守正创新”和“走自己的路”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决贯彻。北大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事业已经进入最关键的冲刺期，希望进一步团结凝聚起广大师生、校友的力量，齐心协力、共同奋进，早日实现几代北大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来源：北大新闻网

摄影：刘学红、曾亮、聂旭辉、朱明明（望京老虎）、李紫嫣、张莉萍、张雪晶、刘颖鹏

编辑：安宁

北京大学正式启动12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

百廿载悠长学府，双甲子薪火相传。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

统，聚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众多著名学者、专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创造了一批又一批重大科学成果，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等中国著名学府”，“我希望北京大学通过埋头苦干和改革创新，早日实现几代北大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根据学校“2048远景规划”和“三步走”战略，建校120周年之际应实现第一阶段性目标、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18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冲刺时期；在此前后，还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兴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等与北大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100周年纪念的历史节点，也是蔡元培先生实施改革和提出与世界高校“平行之发展”愿望100周年纪念的历史节点。

因此，2018年将是北京大学建设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

120周年校庆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回顾光辉历程、展示时代贡献、传递精神价值、引领未来之路的重要过程，也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深化改革、依法治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契机。自2014年成立建校12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以来，通过多种形式征求校内相关单位和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的意见，学校决定在今年庆祝建校117周年之际，宣布提前三年正式启动120周年校庆的各项筹备工作。学校已经原则通过了校庆筹备工作方案，下阶段将在充分发挥校内各单位和师生校友积极性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学术出版、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校史研究、口述史研究、师生校友活动、筹资发展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120周年校庆网站已经初步建成和上线启用，具有建议、申请、征集、捐赠等功能模块，包含校庆咨询、继往开来、规划项目、有你有我等版块，发布了部分具体项目，下一步将继续改进完善。

120周年校庆对于所有北大人、所有关心北大的人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欢迎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和海内外关心支持北大发展的社会各界人

士积极参与校庆筹备工作，出谋划策，
贡献智慧与力量。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发展校园体育 增强师生体质

——北京大学第22届体育文化节暨2015年田径运动会开幕

4月25日上午，以“发展校园体育 增强师生体质”为主题的北京大学第22届体育文化节暨2015年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在五四体育场举行。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7个单位组队参赛，有近6000名教职员工和6000余名学生参加102个运动项目的竞赛、团体操表演和入场式。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等校领导出席开幕式。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万明东，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张青山，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史利国，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席杜松彭，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王岩应邀出席。开幕式由副校长高松主持。

首先，由体育教研部主任李宁主持入场式。本届入场式由51个院系及部门组成的队列完成，队列步伐整齐矫健、口号铿锵有力，充分展示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理念精神。

林建华在开幕致辞中首先向在场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强调，开展校园体育运动、增强师生员工体质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体育事业在2014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林建华高度赞扬了体育文化节在营造校园体育新风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即将迎来北大117周年校庆和五四运动96周年纪念日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他希望全校师生员工进一步激发热情，鼓足干劲，在“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指引下，坚定信念，脚踏实地，为早日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而努力。

最后，朱善璐宣布北京大学第22届体育文化节暨2015年田径运动会开幕。

(文/刘艳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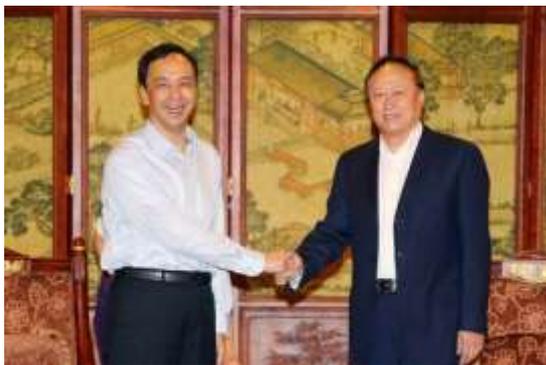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北京大学

5月4日下午，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师生代表座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黄敏惠，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孔廉，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元丰等陪同访问。

这是时隔17年后，朱立伦再次访问北京大学。1995年，时任台湾大学会计系副教授朱立伦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8年时任台湾大学会计系教授朱立伦随台湾大学代表团参加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活动。此次朱立伦再次回到曾经工作过的校园，表示“倍感亲切”。



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会见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首先在英杰交流中心会见了朱立伦一行，他说，1995年朱立伦来校担任客座教授，并为1994级本科生讲授专业必修课，虽然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但给光华管理学

院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与北京大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这里谨代表北大师生对朱立伦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朱立伦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间严谨的教学态度给北大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师生互动相长”的教育理念令学生印象深刻，这与《北京大学章程》中提出的“师生治学”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朱立伦先生的治学精神、自身素养与北大精神很契合，希望朱立伦先生不忘在北京大学教书、生活的那些日子。

朱立伦感谢学校的热情接待。他说，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学术重镇，台湾大学学生最尊敬的傅斯年校长曾是北大的代理校长，将民主的校风带到了台湾大学，影响了台湾大学。

朱善璐表示，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优秀人才是北京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北大正处在自身发展的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牢牢抓住重大历史机遇，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步伐，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作出新的贡献。他诚挚邀请朱立伦先生能常回

北大看看，希望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来北大教书。

朱立伦表示，对此次燕园之行充满期待，时隔 20 年后再次来到北京大学，感觉校园及周边环境与当初变化很大，中关村地区如今已成为高科技的重镇。他还回忆了在校生活期间与学生、同事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座谈会现场



北大校长林建华和朱立伦在座谈会上

随后，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了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欢迎辞中表示，朱立伦先生是北京大学师生熟

知的人物，也是财会领域的杰出学者。

近年来朱立伦先生不辞辛苦，多次接待赴台交流的北大师生，关心支持北京大学与台湾界的交流合作。他表示，北京大学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北大已与台湾大学、中研院等 17 所台湾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流合作关系。北京大学还是最早面向台湾地区招生的大陆高校之一，早在 1979 年，北大就开始招收台湾学生。目前，共有 468 名台湾学生在北大攻读学位，每年还有近百名台湾交换生在北大交换学习。他鼓励在座的青年学生学习朱立伦勤勉求学的精神，在两岸教育、学术和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朱立伦与共事过的师生代表欢聚一堂

座谈会上，曾经与朱立伦共事的光华管理学院教职工，朱立伦授课班级——1994 级会计系本科生校友，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金融系师生代表欢聚一堂。

会计系原主任王立彦教授回忆当年与朱立伦联络来校客座的往事时说到，上世纪 90 年代光华管理学院正蓬勃发展，在北京大学伙伴院校台湾大学的鼎力支持下，以朱立伦先生为代表的一批骨干教师来到北京大学支持光华管理学院的师资建设。他还提到，虽然两人联络非常频繁，但却因为各自的访学安排从未谋面，今天是两人第一次相见。

1994 级会计系校友马越说到，朱立伦先生能将会计这门有些枯燥的学科教授得妙趣横生，他能用魅力和真知征服他的课堂、他的学生。他不仅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与老师交流互动，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同学，能在课余给学生更多人生启迪。

朱立伦动情地说，很高兴再次回到北大，回到光华管理学院，看到了许多老朋友，也看到了许多新朋友。他说有这样一句话：一日台大人终身台大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北大，那就是一日北大人终身北大人。“这次回到北大校园、回到光华管理学院，把我的许多回忆都带回到了 1995 年和 1998 年。1998 年校庆时，我们很开心地庆祝光华管理学院新楼落成，我也是剪彩人之一，这一晃就 17 年了。我特别祝贺光华管理学院

30 岁生日快乐，相信未来光华管理学院一定能成为世界顶尖的管理学院。”

“在北大任教期间，我除了感受到同学们的认真努力外，也体会到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同学求学的辛苦。住在勺园，能与很多同学一起吃饭一起交流，到了周末，很多同学主动当我的导游，骑着脚踏车，一起去清华、圆明园、颐和园，一起去长安街……过去 20 年里，两岸都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兴起，在下一个 20 年里，这样的发展要如何转型，可能也是一个新挑战，这也是在校园里要重新思考的。”



朱立伦与部分师生代表合影

座谈会最后，朱立伦一行与北大师生合影留念。（文/新闻网记者 姜南）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采薇阁开园

4月26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在朗润园采薇阁举行开园仪式。校长林建华，原校长王恩哥、周其凤与百余名诗人、诗评家、北大师生齐聚未名湖畔，共同见证开园。仪式由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主持。

在北京大学艺术团带来开场音乐小提琴演奏、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朗诵了散文诗《永远的校园》之后，开园仪式正式开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教授首先致欢迎辞，他简要回顾了北大前辈诗人与校园的密切关系，表达了对北京大学诗歌研究未来的展望，并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发表致辞，他希望诗歌在青年的成长以及大学塑造民族精神、培养优秀人才过程中，能为社会正能量代言，对时代精神起到引领作用。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在致辞中风趣地介绍了自己与诗歌、诗人的渊源以及对对中国诗歌研究院的祝福，前校长王恩哥也在致辞中对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的开园表示祝贺。

嘉宾代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歌理论批评家孙绍振表示，中国应继续保持和发扬诗国传统。诗人代表、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西川在发言中描绘了中国诗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展望了诗歌研究院的未来，并期待诗歌研究院的成立能对当代文化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明介绍了诗歌研究院的概况，对众多诗人、学者和社会各界对研究院成立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表示了感谢。陈晓明表示，今后诗歌研究院将坚持“秉承百年创作，面向当代青年”的宗旨，努力促进新诗觉醒。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将继续保持和各相关学科的紧密合作关系，同时勿忘“接地气”，持续关注北大青年学生的诗社等诗歌团体。此外，研究院致力于和其他高校的研究机构、各地域创作团体建立友好关系，乐于为创作、研究各方面的沟通搭建平台。目前，诗歌研究院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良好的学术互动已经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未来诗歌译介、国际交流开展方面的工作力度将逐渐增强，侧重于将北大百年诗歌传统向外延伸，与国际诗坛建立对话，不断开展诗歌教学，培养青年创作研究人才。

会上还宣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贺信，法国公使白良（Jacques Pellet）、冰岛大使司迪方（Stefan Skjaldarson）、马其他大使克俚福（Clifford Borg-Marks）等多位外国使馆大使、公使亦到场致辞祝贺。



合影

参加活动的嘉宾还有灰娃、孙玉石、任洪渊等学界前辈，以及林莽、唐晓渡、欧阳江河、张清华、王光明、杨克、陈涉云、李黎等著名诗人、诗评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创办人黄怒波（诗人骆英），海淀区政协主席彭兴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曾凡华等也参加了活动。

开园仪式上，歌剧艺术家金曼为到场嘉宾带来了歌剧表演《沁园春·雪》，青年歌唱艺术家、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陈小朵演唱了歌曲《春江花月夜》，青

年舞蹈家邱思婷带来了舞蹈表演。开园仪式在热切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中结束。



“审美·思想与时代——当代中国新诗 30 年学术研讨会”现场

采薇阁开园仪式是北京大学“诗歌周”系列活动之一。下午两点半，在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明的主持下，在朗润园采薇阁举行了“审美·思想与时代——当代中国新诗 30 年学术研讨会”，黄怒波、西川、欧阳江河等十数位诗人和诗评家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会议梳理了当代新诗发展的历程，对当代诗歌审美精神的构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当晚，“远在远方的风”第十六届未名诗歌节暨第九届未名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厅举行，此次颁奖典礼由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

背景链接：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9月，涵纳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和诗学与翻译学研究中心，现有成员多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诗学研究教授、诗评家或诗人。中国诗歌研究院依托北京大学多学科、多语种、人才密集的学术优势，整合各领域研究机构，开展诗歌研究，尤其着重于百年以来的中国诗歌的研究；鼓励新诗创作，同时加强对中外优秀诗歌的译介和推广。迄今为止，研究院已成功举办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评奖活动及“传承与创新”“古典与现代”、东北亚诗歌研究、中国·冰岛诗歌研讨会等诗创研讨会20余场，并开创设立北京大学“驻校诗人”，邀请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台湾诗人余光中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诗人到校开展讲座，通过一系列对话交流活动让校园内的诗歌爱好者

得以和大师深入沟通，加强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人才的培养。

由于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学术研究队伍稳定、成果突出、组织运行良好，两次被北京大学社科部评为优秀研究机构。对于未来，院长谢冕表示，将在既有成果和架构的基础上，踏实做好已有项目和研究，继续将中坤国际诗歌奖评奖工作做好，在研究上致力于对于中国诗歌传统进行更成体系、更具有当下深度的阐释。（文/新闻网记者 程珊珊 程梦稷）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读书最宜燕园春——图书馆举办“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博雅衣绿，未名桃红，“4·23世界读书日”又在春天里如期而至。在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大力倡导“全民阅读”、人人读书的热烈氛围里，为配合北京大学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文化信息素质教育，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校园文化，北京大学图书馆以“读书最宜燕园

春”为主题，策划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日系列活动。

一、举办多场“北大读书讲座”

本学期的北大读书讲座从4月10日起开讲，邀请到了毕飞宇、舒乙、朱良志、辛德勇等名师大家，每场讲座有演讲、互动和赠书等活动，并通过图书馆主页、官方微博、微信等发布最新消息。

二、换书大集活动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作为首都图书馆联盟“北京换书大集”活动的唯一高校分会场，图书馆鼓励读者带上闲置书前来换取自己心仪的书，与众多爱书之人互通有无，分享阅读乐趣。

4月17-18日，换书大集在图书馆东楼展厅开集，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热情参与，共有300多人换走了1300余册书。读者纷纷对这种免费交换书刊、共享绿色阅读的形式赞赏有加，并建议增加活动的频率。



换书大集上正在选书的读者

三、举办“知书·知脸·也知心”阅读摄影展，推荐好书

今年的展览引入了欧美流行的书脸摄影(Bookface)，通过与北京大学青年摄影学会合作，以人书嫁接的摄影方

式推广阅读，让书籍的封面“活”过来，与读者来一场带着人情味的心灵对话。

此次推荐展出的49种图书，主要精选自32家媒体的2014年度好书榜，并补之以14所知名大学校长推荐的部分经典图书。其中部分图书的封面被拍成了各具创意的“书脸”摄影作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西区阳光大厅和图书馆官微同时进行实体和线上展出。

4月22日，“知书·知脸·也知心”阅读摄影展一经开幕，即以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形式新颖的特点，吸引了读者驻足观看，线上展览的阅读量也是直线飙升。



阅读摄影展

四、评选2014年度“未名读者之星”并发布

图书馆每年会根据年度借阅数据评选出排名前10的读者，授予“未名读者之星”的荣誉称号。今年的颁奖典礼将于4月24日读书日系列活动的主题读书讲座上举行。本届“读神”将获赠主讲

人（知名作家毕飞宇）的签名图书一套，以及图书馆的特别借阅优惠政策。

五、开展“脱机自习日”特别策划活动

图书馆与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脱机自习日”活动颇受读者欢迎。4月17日，又有数百位读者参加了这项活动——放下手机，暂离网络，来图书馆度过一些安静的时光，回归深度阅读。

六、经典电影展映

从4月27日开始，图书馆还配合好书榜精选传记类励志题材，在图书馆视听欣赏区进行电影展映。

注：“读书最宜燕园春”图书馆2015年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更多详情请见北大图书馆主页、官方微博、微信、人人网主页。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全球创新论坛2015年会召开，以思想共鸣引领变革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全球创新论坛2015年会：创新驱动未来”于4月17-19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全球创新论坛2015年会”汇聚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管理大师及学者，带来更为广阔的思维与视野，以思想共鸣引领变革方向。本次论坛由北大后E促进会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关村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学习型中国促进会协办。



会议现场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出席并讲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代表主办方致辞，科技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陈春花，万科集团前高级副总裁毛大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多位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围绕“创新驱动未来”作了精彩演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院长张黎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开幕式。

陈章良在会议致辞中表示，以下几个领域今后会发展很快，第一个是信息领域，第二个是新材料领域，第三个是

新能源领域，第四个是生物技术领域，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很大的突破，而且在某一个领域里会形成很大的产业。他还透露，中国科协有 200 多个学会，包括各个学科的学会。中国科协把 200 多个学会细致地进行研究，看看未来的生长点在哪个地方，哪几个点将形成非常重要的产业。该工作完成后，将上报中央批准启动创新科技，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徐冠华在主题演讲中表示，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家间的竞争，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迅速增长，和国家的社会发展需求，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指出，中国科技发展当前有四个问题非常紧迫。第一，缺乏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第二，缺乏具有国际引领性的创新产品；第三，缺乏有效地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完善的市场化环境；第四，缺乏鼓励创新，弘扬自信的文化氛围。

姚洋代表北京大学主办方对与会嘉宾的光临表示欢迎，他表示，互联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现阶段中国的创新还是要结合制造业。他指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中国制造业 2025 计划，这个计划非常切合我们国家实际。

在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粗线条看今天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就是两个力量在对冲，一个叫下行，一个叫创新，到底冲出什么结果，不但决定今年的经济增长，也决定了 2020 年及长远战略目标到底能否实现。

陈春花为主题演讲中表示，企业要回归到顾客价值和经营本质，淘汰企业的一定是顾客，绝不是技术和管理。

黄怒波谈到企业家精神时表示，企业家需要承担利润之外的其它社会责任，“创新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满足其梦想和领袖欲望，这才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同时，黄怒波强调，现在的创业者应该意识到“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俞敏洪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技术怎么变迁，移动互联网带来这种商业颠覆的模式，会改变某种商业的形态。每个人想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还是修炼自己，把自己修炼成，你就把企业，把你做的事业给修炼成了。

本次论坛为期三天，著名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创新领袖、北大校友和 1400 多名参会嘉宾云集北京会议中心，以全球视野洞见前沿，以本土创新引领未来。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5年4月23至24日，“大学图书馆的未来——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图书馆馆长参加了研讨会。

哈佛大学副校长、图书馆馆长 Sarah Thomas 女士发表题为“*The Disrupted Dinosaur or Rising Phoenix: the Future of Academic Libraries*”的主题演讲，她首先通过提问引起思考，随后介绍了美国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合作开展的一些项目，以及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例如空间变革，未来的图书馆是集知识、文化和社会的中心，文献资源的来源渠道也将更加丰富和全球化，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读者、空间、馆藏仍然是图书馆的三大要素，图书馆的功能不会消失，通过自身的变革，图书馆必将会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介绍了今后几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策略。包括：统筹图书馆资源建设经费的预算与协调使用；加强馆藏资源结构的调整，加快馆藏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加强特色资源的建设，提高保障水平；重点进行开放获取资源的建设；通过新技术应用及平台建设，加强资源建设与服务的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整合揭示各类资源。他希望学校能够以5%的涨幅每年递增校拨文献资源建设经费，以保证师生最基本的文献资源需求。

在两天的会期里，馆长们围绕本馆或所在区域大学图书馆面向未来所作的尝试或探索展开讨论，内容涉及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使命与发展方向、资源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创新、读者数据创新应用、空间变革、特藏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发展环境前瞻、跨越式发展途径探究等。研讨会上，馆长们的发言频频引发共鸣，也就某些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在自由发言环节，馆长们还就可能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中国和北美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就共同关心的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主题充分展开了讨论，对于图书馆的

转型方向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对于增进相互了解，明确未来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以及开展国际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和推动作用。研讨会由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图书馆联合发起，每年轮流主办，希望通过中国和北美两个

地区大学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共谋未来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希望借此研讨会，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不遗余力地贡献力量。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到访北大

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2015年4月21至22日，联合国前任秘书长、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展开对北大的访问和交流活动。安南先生高级顾问拉明·西塞(Lamin Sise)，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高级官员温佐(Zaw Win)陪同到访。

安南此次到访，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邀请，与师生座谈并发表演讲。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设立于2012年，旨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各领域学术大师来校举办讲座、开设课程、合作研究等，增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综合竞争力。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弗雷德里克·

杰姆逊、弗朗西斯·福山、王赓武在内的近20位学者入选。同时，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围绕“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总主题，近年来已成功举办包括乔姆斯基、霍米·巴巴、迈克尔·桑德尔、傅高义等知名学者在内的演讲会。

4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临湖轩会见了安南一行。柯杨对安南第三次访问北大表示热烈欢迎，她回顾了安南先生与北京大学之间的深厚渊源。早在1998年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安南就曾发来贺信，并委派代表前来祝贺。2004年，首届北京论坛召开之际，他又委派当时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携其贺辞亲临论坛。2006年，安南在他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即将结束前，首次访问北京大学，

当时的演讲就曾引起知识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2009年，安南又以联合国基金会董事的身份访问北大，与北大学者和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柯杨感谢安南此次来访与北大师生分享他数十年来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和睿智观察。她还将安南2006年访问北大时的照片赠送给他作为纪念。



柯杨赠送安南2006年访问北大的照片

随后，安南与北京大学学者和学生代表围绕“世界秩序的几个要点”（Some Key Points in the World Order）进行座谈。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袁明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培玉、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植以及历史、法律等领域的学者代表和来自北京大学学

生模拟联合国协会、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安南首先从个人经历出发，谈到近年来世界面临的巨变以及联合国为应对挑战而所作的努力。与会教授随后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分享了他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与安南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涵盖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善、中国在构建新秩序中的角色、非洲发展的前景、极端主义威胁的应对、青年领导力的培养等议题。安南结合自己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卸任后调解国际争端的经历，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强调了各国政府提升自身能力、加强国际多维度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表示，目前解决这些问题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有待国际社会更多的合作与努力。最后，作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几位学生代表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安南回答了学生代表的提问，并表达了对北大青年学子的勉励和祝福。

4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会见了安南一行。朱善璐欢迎安南再次来到北大，同时感谢联合国对北京论坛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有机会邀请他出席今年北京论坛。安南表示，

很荣幸受邀作为“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嘉宾，他对与北大师生的交流座谈印象深刻，学生的提问体现出 21 世纪青年对于国际事务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和思考。他表示，有机会一定常来北大，也希望北京论坛越办越好。最后朱善璐代表北京大学向安南赠送联合国邮政署、北京论坛和中国集邮总公司联合发行的纪念邮封。



朱善璐会见安南

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英杰交流中心会见安南，并向其颁发“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铜牌及证书。随后，安南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以及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嘉宾，在阳光大厅发表了题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Towards a More Harmonious World Order）的主题演讲。演讲会由袁

明教授主持，300 余名北大师生到场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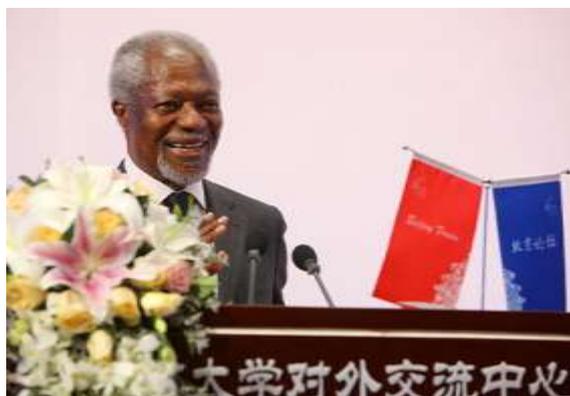


林建华向安南颁发“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铜牌

在演讲前的致辞环节，林建华表示，安南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重视大学发展与青年成长，并在此过程中，他与北大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 10 年中，安南为消除贫困、制止冲突和促进民主作出的重要的贡献，值得国际社会感谢和铭记。

演讲中，安南首先提到，中国与非洲在古代都有关于“和”的箴言，证明自古以来“和谐”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常常被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迷失了双眼。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门艺术，在联合国工作的几十年中，安南对其中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和谐的根基有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和兼容性的发展以及人权与法治。这三者共同为社会的和

谐和繁荣发展奠定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非洲之间合作与往来日益丰富，双方都希望世界整体的格局是和平稳定的。最后，安南总结说，当今的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财富和权力不再是特定地区的特权，无论是国家、地区和机构都应该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在国际事务中重新处于中心的位置，坚持和谐社会构建的三个基础，中国将会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提问环节，北大的中外学生围绕气候变化与技术转移、维和行动的得失等关心的问题，与安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安南发表题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的
演讲

据悉，在此次访华行程中，安南还出席了他的两本著作中译本的新书发布会，分别是《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及《安南演讲集：

我们人民：面向 21 世纪的联合国》，并接受了央视国际频道“对话”栏目的专访。

背景链接：

科菲·安南 (Kofi Annan)：1938 年 4 月 8 日生于加纳的库马西，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任秘书长。早年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2001 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与联合国一起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安南 1962 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97 年安南先生当选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并于五年后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公认的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书长。在任职的八年中，安南一直在不懈地推动联合国改革进程，致力于将这个声望下降的庞大机构改革成为能够应对新时期新挑战的卓有成效的权威国际组织，赢得了全球广泛尊重。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网教之声

“互联网+”能否助教育“飞”起来

古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斯芬克斯(Sphinx)常向过往英雄提出三个谜语,回答错了,英雄就沦为果腹之物。其中最著名的谜是:有一个只有一种声音却经历四脚、二脚、三脚成长过程的生命。那是……?恭喜你,答对了:婴儿、成人、老人!

如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斯芬克斯之谜就变成背书题目,称不上哲学“迷思”了。同样的谜语用到高等教育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教育要有娱乐性(婴儿)、有生产性(成人)、有教化作用(老人)。

只有这样解迷,网络教育和大学课堂教育才能走出“在线上”和“在现场”的矛盾与冲突。

上学期,我设计的在线教育课程以失败告终。我的“混合制”课程交叉有“在线上”学习,“在现场”讨论。起先,以为是我录音的鸭嗓子吓跑了学生。调查发现,学生压根儿就没有去点击在线学习的链接。

在我的课程中,传统的“在现场”教学已经成为一个个“桥段”,有诸多的实例“插曲”在抽象概念讲解中。习惯了富有娱乐性的“桥段”和“插曲”的学生不再愿意被动收听“线上”的课程广播。我失败的经验显示,“在线”教育要创造有“现场感”的娱乐性。

论娱乐性,全球有上亿观众的美国的TED在线节目非常受欢迎。TED致力于创意思想的传播。它的成功要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娱乐性和18分钟的“桥段”节奏。节目总管安德森(Chris Anderson)解释说,18分钟大约是一般人注意力可以集中的时间段。而娱乐性则加强观众对思想内容的接受程度。

可是,TED的演讲格式受到许多教育工作者的批评,认为它已经意识形态化。我曾经在丹麦观摩一个当地为TED演讲做的排练。话素、场面、动作都经过设计,都从怎样调动观众情绪的角度反复编排。教育工作者认为,TED的公共沟通方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考和

交流方式。它附着着把其他的思想交流方式给边缘化了，而年轻人把它当作唯一的当然形式。从一种创新形式变化为垄断的思考方法，它意识形态化，它抑制多元性。萎缩的多元性导致思想的贫困。

批评 TED 的人指出，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或应该娱乐化的，许多非娱乐性的知识有社会必须的生产力。知识入门可以娱乐，登堂入室则必须忍受枯燥和抽象的学习过程。就像跳华尔兹舞和登险峻高山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后者的心理愉悦出现在痛苦的攀登之后。在我的课堂，段子是开胃的、开心的。之后，学生必须经历紧张和焦虑的思考过程，否则无法洞见信息背后隐含的要义。对应用过程复杂而灵活的知识，学生更加偏好“在现场”的讨论。

“在现场”有助于知识入心。网络教学的先驱西门斯（George Siemens）认为，知识的本质是“联系性”（Connectivism）。只有处于各个知识点相互连接的场景中，知识的原理、应用和内容（Know-why, Know-how, Know-what）才能三位一体，入脑入心。对此，我深有体会。浸淫到现场讨论过程中时，学生能来回往返于思想交锋，加深理解概念的作用和边界。

而“在线上”的课程难以产生“在现场”的身心体会效果。就像听导航指示，我们开车会有不知所措的感觉。但是，阅读比较平面地图后，对街区的拐弯抹角有直观感觉，我们才容易使用导航指示。

“在现场”的另一个重要功效正慢慢被发现，那就是“场效应”。我们早就知道动物，特别是鸟类，有辨别磁场的的能力。其实，人也有，只不过非常弱。巴塞罗那的艺术家哈比森（Neil Harbisson）是眼睛的“色盲”，却能够听到“颜色的频率”。他能凭借光谱光波频率来辨别颜色。在他头脑中，音乐和绘画都是以音频为基本单位，可以互换。奥地利的康尼格（Peter König）博士研究第六感官多年。他的“感官场”团队发明一种腰带，让人像鸟一样有磁场方向感。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麦克弗森（Fiona Macpherson）指出，人有许多潜在的感知能力，例如方向感和平衡感等，而被强化使用的五官感受掩盖了其他 28 种感知能力，但它们依然存在。联系到课堂教学现场，所有的感官能力，无论我们是否有明显意识，都在发生作用。目前，“在线上”的教学应用还无法模拟人的全景感知效果，尚达不到“在现场”的场效应。

即使未来的网络技术能够近似完美地复制“娱乐性”和“生产性”，教育的另外一个社会功效——社会教化作用，仍然需要“在现场”的课堂媒介。教育不仅是关于如何让个人成才，还涉及社会合作。学习对别人有用，这是社会教化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国的科举制度，欧洲早期教会办的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科学，而是社会教化。每个现代国家的教育制度仍然包含这个功能，只是执行的方式有差别。如果忽视、甚至摒弃教化的作用，任何教育新形式都不会有长久的制度生命力。

森林中没有人，树倒了，有没有声音？这是每个教育家都需要回答的哲学问题。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在现场的感知”是人性自觉的第一要素。不在“现场”，无所谓时间和存在。教育是什么？“在线上”与“在现场”之间如何相互延伸、相互成全、相互包含？它是我们这一代的“斯芬克斯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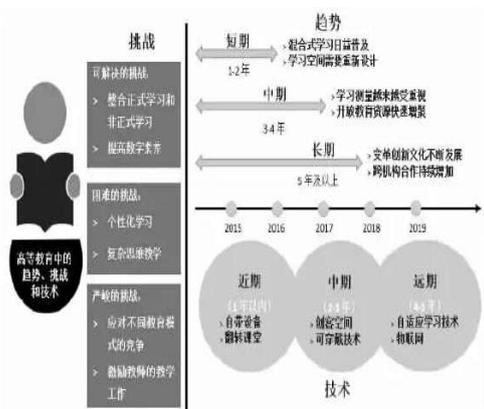
文章来源：中国远程教育杂志

作者：鲍勇剑

未来五年影响高等教育的技术力量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 高等教育版》发布，17 个国家 56 位专家投票预测

——未来五年影响高等教育的技术力量



北京开放大学项目组 供图

北京开放大学项目组 供图

未来五年，高等教育机构将会面临什么形势？有哪些趋势和技术将会驱动教育的变革？有哪些挑战是我们可以解决或难以克服的？我们如何制定有效的战略化解决方案？在新媒体联盟(NMC)与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协会(ELI)最新发布的2015年高等教育版《地平线报告》中，我们一起寻找这些关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问题的答案。——编者

由新媒体联盟(NMC)与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协会(ELI)合作完成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 高等教育版》(以下简称《地平线报告》)在近期发布,该报告依据 17 个国家 56 位专家的投票结果,预测了 2015 年至 2019 年加速高等教育技术采用的关键趋势、阻碍高等教育技术采用的重要挑战以及高等教育中教育技术应用的重要进展。

变革、创新、合作

加速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果智能手机能够在教和学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教育机构就应该改造基础设施来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创建能够促进学习和创新的环境,已经成为大学的责任。《地平线报告》指出,为了培育创新人才并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组织结构,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激励创新和创业。

当前,教育工作者们正借助这些模式开发新的方法和项目,驱动自上而下的变革。由于学生将日常使用的技术应用到学习上而产生了新的期望和行为,高等教育有必要为他们提供更为适宜的服务。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校长说:“大学需要制订政策来激励更多的创新,鼓励更多的冒险和合作,开展更多准确反

映当下工作情境的活动。大学的组织模式要面向未来,要能够推动本地和全球的经济与文化。”

与此同时,大学之间的合作对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日益重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了各类联盟,以整合资源或彼此进行战略合作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创新。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大学能够跨越国界进行联合,就技术、研究或共同发展目标开展合作。大学课堂借助技术支持,强化了开放社区和大学联盟的趋势。《地平线报告》显示,教育机构在未来将成为更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中高等教育机构的长期生存及其作用依赖于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

如今,人们对利用新的数据来源促进个性化学习、开展形成性评价、开展绩效测量越来越感兴趣,由此催生了一个新领域——数据支持的学习和评价,也就是学习分析技术。学习分析是网站分析在教学领域的应用,借助数据来分析学习者的特征,收集和分析学习者在网络学习活动中进行交互的大量信息,以便提出更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学习,甄别有可能辍学的学生,评价影响学生完成课程和获得成功的因素。

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发起了开放课件运动(OCW)，其2200多门课程的教学材料都能够在网上免费访问。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纷纷响应，也启动了自己的开放学习项目。

十几年后的今天，开放教科书是让更多学生能够负担得起教育费用、削减过高成本的可行方式。在美国莱斯大学免费教科书计划和大学开放教科书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开放教科书也日渐流行起来。

同时，在线和面授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也在高等院校中日益流行。最近，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有1/10的学生参加全在线的课程学习。《地平线报告》指出，随着在线学习形式的持续增长，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开发更多的在线课程来代替或补充现行课程。

为了应对现代化的学习方式，学习空间也需要重新设计。很多学校纷纷升级无线网带宽来创建“智慧教室”，并支持网络会议和其他形式的远程协作交流。《地平线报告》指出，这种趋势要求大学考虑将校园的非正式环境改进为促进学习的场所。有些人流密集的休闲场所，例如大厅、中庭和走廊等被专门

设计成利于学生聚集和开展更有效工作的场所。

个性化学习、数字素养、复杂思维 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

互联网的来临使人们通过便携设备就能够获取大量信息，人们越来越关注自主的、基于兴趣的学习。这类学习在博物馆、科学中心以及个人学习网站中尤为常见，可以归类为非正式学习。学生按照自己的学习路径与兴趣进行学习，从而提高了学习的参与性。许多专家认为，非正式与正式学习相结合可以创设高等教育的新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好奇心以及最重要的创造力。

但是，《地平线报告》指出，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来评估非正式学习的经历。这需要教育系统制定国家政策，进一步指导非正式学习的认证。许多高等院校也开始意识到，为加强学生的数字素养，必须优先培养师资队伍。

卡内基·梅隆大学开放学习项目的研究显示，自适应学习环境的智能辅导几乎与一对一辅导教学同样有效。在2012年，他们宣布拨付900万美元用于资助学习模式的重要突破，专门投资于几个开发自适应学习解决方案的组织和院校，并建立了“个性化学习网络”。

为了让个性化学习能够实现，教育研究者强调学习环境要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在设计或实施个性化学习方案和活动之前，必须精确了解学生的喜好以及需求，使学生的学习更具有灵活性，尽可能高效，同时仍然需要足够的指导。

当今世界，高阶思维是一种宝贵的技能，对于理解和解决复杂的、现实世界中面临的问题非常必要。“复杂思维”指的是理解复杂性事物的能力，或认识系统如何运转并借此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鼓励复杂思维与交流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项挑战。

如今，教育的新模式正在为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新的模式既能够提供省钱的学习机会，又能够让学习者更快地获得学位，这将越来越让人期待和向往。但是，不断上涨的私立和公立大学学费使得这一挑战更加严峻。

另外，对于教师工作的考核，很多大学将研究置于比教学更重要的位置。根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方法，一所院校的科研影响力是13个标准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学术界也普遍认为，研究的成果比教师的天赋和技能更为重要。但是，这种想法导致忽视有效的教学实践，导致单一从事教

学的人员薪酬较低，也往往被人们轻视；而学生则不得不接受大学研究人员过时的教学风格。为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在2014年至2015年教育部拨付的补助资金以及在促进高等教育优质教学的项目预算中，安排了高等教育中注重学习体验质量的重要内容。

翻转课堂、创客空间、物联网 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技术方向

《地平线报告》将教育技术定义为“可用于提高教学、学习和创新研究的工具与资源”。

自带设备(BYOD)和翻转课堂被《地平线报告》列为将在1年内被采用的教育技术。

自带设备是指人们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带到学习或工作场所的做法。2013年，思科合作伙伴网络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95%的受访教师在工作中自带设备。还有研究显示，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超过3.5个小时。对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自带设备的重点不仅仅是“设备”，而是用户装载到设备上的个性化应用程序，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组织笔记、教学大纲和校内外日程表。

而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则是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自主权从

教师转移给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能够将课堂内的宝贵时间用来开展主动的基于项目的学习，共同研究如何应对本地化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其他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学生能够随时访问在线工具和资源，教师也有了更多的时间与每个人交流。

《地平线报告》显示，翻转课堂非常适用于高等教育，重新调整的课堂模式让学生在大型导论课上有更多参与课程以及与同学交互的机会。教师也能通过关注教学内容，尤其那些对学生有挑战的内容，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

根据《地平线报告》，未来2年至3年被高等教育采用的技术是“创客空间”和“可穿戴技术”。

“创客空间”通常立足于社区，是一个技术爱好者经常聚会、分享和探讨电子硬件、制造工具、编程技术和技巧的地方。“创客空间”中常见的工具包括激光切割机、电烙铁、乐高玩具、阿多尼斯开源平台(Arduinos)、树莓派(Raspberry Pi)电脑和电路小配件等。它的总体目标是为人们提供自由实验和亲自制作物品的地方，并促进创造性社区的形成。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的“创客空间”中心。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近期设立了首个实验班，装备了大量先进的技术设施，包括55台3D打印机和扫描仪。英国普利茅斯艺术学院也与欧洲一些主要的微观装配实验室合作，设计了以工作坊和实习形式开展的专业创意项目，学生和社区成员可自由使用3D打印机、扫描仪、数控铣床、数控机床、激光切割机和乙烯基切割机等。

谷歌眼镜能够以免提形式显示信息，通过语音命令进行通信、广播与记录学生的培训活动。这种能够被用户以配饰形式的“可穿戴技术”，优势在于它能够方便地整合睡眠监测、运动记录、地理定位和社交媒体交互等工具，还能实现虚拟环境。《地平线报告》显示，可穿戴技术在未来几年内将显著增长。

再想象一下，如果机器能够“学习”人们的学习方式，适应每位学生的学习进度并实时调整内容，或者当学生需要时提供个性化辅导，就能实现大规模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这就是最新出现的自适应学习技术。

根据《地平线报告》，自适应学习技术和物联网将会在未来4年至5年被教育领域广泛采用。不久的将来，互联

网将实现现实世界与信息世界物物相连的网络。那时，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学习将变得更加高效与合理。在教学方面，高等教育中物联网的应用将会整合个性

化学习材料和提供即时反馈的形成性评价技术，开展更有效的混合式学习。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北京开放大学项目组

■ 北大人物

张友仁：从昆明到北京

1946年12月1日，云南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这一日，一群暴徒围攻西南联大校门，西南联大的学生奋起反击，展开护校运动。罢课联合委员会组织学生把守校门，加强巡逻。住在新校舍北区的几位学生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从保卫校门第一线换班下来的时候，在宿舍里面各自写下绝命书，在宿舍南边的柏树林留影纪念，然后又回到到保卫校门的第一线。在这张保存至今的照片里面，就有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主人公——张友仁。



1945年12月1日 保卫校门的纠察队员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合影 右一为张友仁

时隔七十年，年逾九十的张友仁谈及这段往事记忆依然清晰。“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同屋的几个同学报名参加敢死队，当时名义上叫纠察队，实际上就是敢死队。准备牺牲了嘛，大家都先写个绝命书吧！后来又去照个相作纪念，想想那时候年轻，真的不怕死。”

他们匆匆赶到校门的时候，外面已经炸响了手榴弹。靠桌椅板凳支撑起来的校门毕竟挡不住门外的暴徒，校门被攻破时，学生们挥着棒球棍就迎了上去……

是役，写下绝命书准备慨然赴死的学生没想到他们不但安然无恙，还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军官总队有一个军官叫崔俊杰，他趁学生不注意钻进校门，我们用棒球棍一下子给他打倒了。我们四个学生把他送到一个教室里，那里有护士学校，给他包扎救治。那时候我们实行‘宽待俘虏’，救治完了，到了晚上由校卫队用行军床把他送回北郊的军营。”

乱世少年，求学几飘零

多年后的冬日寒风瑟瑟，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书房里，白发苍苍的张友仁从容地讲述他少年时代的辗转求学，青年时代的挥斥方遒。一段历史从老人的言语间悄然流泻下来。

生于 1923 年的张友仁在少年时期几度辗转求学，他自己笑言是“跟着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走”。起初在南京读小学，后来转到河南郑州私立第一小学。这所小学是当时裕丰纱厂的老板、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张友仁小学毕业后，赴京参加中考。考上了当时北京最好的育英中学。

随着华北战事吃紧，仅在育英中学读了一年的张友仁回到了浙江老家，在黄岩中学继续读书。可是战火从华北烧到江南，读书变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黄岩中学迁到了当地农村，读书条件非常艰苦。

中学毕业那年参加会考，张友仁一举夺魁，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上大学。那时沦陷区的很多高校已经迁到大西南继续办学，浙江会考第一名的张友仁和第二名的吴全德（电子物理学家）毅然在志愿表上填上了“西南联合大学”。

尽管当时的教育部批准了他们两人的志愿请求，但是张友仁的求学历程却好事多磨。1942 年，中日鏖战，时局动乱，以至于两人第一年竟没有成行。两人一商量，当即给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周炳琳拍电报，请求周炳琳帮他们保留学籍一年。第二年，两人各搭顺风车从浙江避开沦陷区，绕道抵达昆明，两人一路颠簸，跋涉千里，走了将近两个月才到西南联大报到。

到了学校后，吴全德选了工学院电机系，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而张友仁的专业选择过程却一波三折。

“当时的高中是要分文理科的，我们高中并没这么分，到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校长才指定我们几位成绩较好的学生为理科学生，所以我算是理科毕业。”认定了自己是理科毕业的张友仁报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

“我原来志愿报的是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到了昆明以后听老同学说中国搞航空工程的学完了自己还不能造飞机，只能把从美国运来的飞机部件组装一下，而且进那个航空工程系首先要报名参加国民党，我可不愿意参加国民党，那我就不学航空工程系了。”

张友仁后来想要转到能“经国济民”的经济系，就写了申请表向教务主任杨石先申请转系。

“杨石先是学工科的，提倡科学救国。他说你好好的工程不学，学什么经济呢，他看不起经济，就批了个‘不准’。”

尽管转系遇到挫折，但是张友仁觉得航空工程非他所愿。大一的时候，张友仁又到班主任李继侗教授那里申请转经济系，同时在他办公室外面又遇到经济系主任赵迺抃。

“赵迺抃就跟李继侗说张友仁要转经济系，你帮个忙给转一下吧，这么一来才转到经济系，当时是背着教务主任转了经济系。”

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候，张友仁不只听经济系的课，还经常活跃在其它院系的课堂上。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讲文学，讲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背景，讲当时的社会生活，很受学生欢迎，张友仁也非常爱听。

“沈从文上课时，教室里只有几把扶手椅，我们男同学全部都给占了，女同学去了就没地儿坐了就站在教室后面，沈从文把讲桌搬到后面放倒，让几个女同学坐在讲桌上。”

张友仁还喜欢听闻一多的课，他对这位斗士印象深刻。“我原来想象闻一

多是一个诗人，应该很文雅。后来见到他，一看这哪儿是文雅啊，不像个诗人，倒像头雄狮！那时的闻一多正蓄须明志，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剃掉胡须。

当时张友仁与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请闻一多担任导师。那时候闻一多住在昆明城外的昆华女子中学。闻一多讲完课已值夜半，张友仁同几十个同学送他出城区西门。在那个政治恐怖的年代，晚上九、十点钟几十个人出城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门楼上警察就下来查问，正好护送的同学中有云南籍学生，通过他用云南方言跟警察表示“我们是送老师回家的”，才得以放行。

感怀家国，书剑话当年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很多学生投笔从戎。高年级的学生不断被抽调到军队中担任翻译。那时刚入学不久的张友仁没有被抽调的机会，但是他也把抽调学生要读的《军事会话》和《军事术语》等书背得滚瓜烂熟，随时等着上前线。

虽然没有上前线，但大后方的生活也整日提心吊胆。那时候敌机经常轰炸昆明。“日本飞机来轰炸，国民党的高射炮就开火，结果打不着，日本人的飞机很刁钻，飞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弄

得国民党军队干着急却又无可奈何。后来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他飞得比日本飞机还要高，把日本飞机打得再也不敢来了。”

两年后抗战胜利了，很多学生脱下军装重新回到了西南联大，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尽管报国心切，张友仁背得滚瓜烂熟的书终究没有派上用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遗憾。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学生可以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之间自由选择学校继续学习，张友仁选择了北大。

1946年，北大和其它几所学校的老师学生奔波三千里回到北京复校。这时候学生运动不断发生，北大学子多次冲在最前面，少年意气的张友仁更是当仁不让。1947年的“五二零”大游行中，张友仁担任“特别纠察”。“打头阵的是穿着军装的学生，他们都是在抗战的时候参军、抗战胜利以后退伍的。队伍前进有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如果有国民党军警阻挡，我可以带领大家改道前进。”

1948年，北大许多学生的名字出现在国民党要抓捕的“黑名单”里，学生们为了避免被抓捕都到解放区去了。

“到解放区还要通行证，那时候北大有几个学生会刻图章，他们负责制作假通行证，造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不但北大学生用这种通行证能到达解放区，而且北京的许多进步人士也用它到达了解放区。”

情系燕园，耕耘半生忙

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张友仁留校担任助教。1948年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张友仁担任北京大学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委员兼政治课教师。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建设亟需人才，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师不断被调出去担任中央领导的秘书、北京各局副局长。谈到此时，张友仁说自己得以留校任教还得感谢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

“调到我的时候，尽管我个人不愿意，但是还得说服从组织分配啊。后来彭真知道了，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把我的人都调走了，我北京大学还办不办！’彭真这么一说，我才在北京大学留下了。”



1948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教师们到香山碧云寺敬谒中山先生纪念堂和衣冠冢，摄于金刚宝座塔，右二为张友仁

1950年，张友仁被教育部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进修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第一届研究生。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张友仁负责北京大学经济系调整的工作，名义上叫做联络员，实际上就是经济系院系调整的负责人。他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4所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教师中，选拔了一批教师到新北大经济系任教。1952年秋，北大与燕大合并。张友仁搬到燕园，负责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工作，并从原来的助教晋升为讲师，并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张友仁在学术上成果颇丰，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撰写或主持撰写学术著作50余种。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物质利益》《在改革的实践中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他翻译或校译的学术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计划经济学》《论财富的分配》《大城市的未来》《房地产经济学》等。

此外，张友仁曾担任北京政治经济学会会长、北京《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北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会长、北京经济学总会理事、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会顾问、西南联大校友会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或社会职务。

六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也使张友仁桃李满天下。厉以宁在《难忘的大学生时期——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这篇文章中回忆道：“我大学二年级时，他（张友仁）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设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厉以宁至今仍保存着张友仁指导他写的毕业论文，“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

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1979年，张友仁收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生——从台湾来的林正谊。这位林正谊本来是要去中国人民大学的，因为身份特殊，人民大学没敢收，后来被推荐到北大。“别人不敢要他，我敢要他！”林正谊就成了张友仁的研究生。29年后，这位更名为林毅夫的学生成为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后，张友仁开始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之路。1982年，他应邀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多伦多大学、曼尼托巴大学、里贾纳大学、卡尔加里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莎蒙弗雷热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渥太华大学等十所大学旅行讲学。1985年，他又由国家教委派，作为中荷两国交换教授，到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梯尔堡大学讲学。1987年至1988年，他应邀到西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授一年。1988年，应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尔胡思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同年，又应法国巴黎人文科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前往访问和讲学。1989年，应加拿大政府邀请，前往加拿大多所大学作学术访问，并在加拿大国家统计局讲学。

1989年以来，四度应邀到美国多所大学访问、讲学和从事合作研究。

老而弥坚，为霞尚满天

1993年，张友仁教授在北大离休，但是离休后的生活并没改变多少。直到去年为止，91岁高龄的他还在指导研究生。此外，张友仁还整理了一些相关著述以及后来的学者研究文献，出版了《周炳琳文集》《周炳琳研究文集》等著作。

“周炳琳曾做过民国教育部常务次长，他写的短评、评论也都是用笔名，很多人不知道是他写的。我替他整理一下。”

近些年来，张友仁整理了家中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几乎贯穿了北大七十年的历史和国家发展变化各个时期的图景，分别赠送给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保定军校纪念馆、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档案馆、胡适故居纪念馆、马寅初纪念馆等机构。

此外，张友仁笔耕不辍，撰写了很多回忆性著述，如《我心中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北大恩师》等。所撰合集《张友仁回忆文集》也于2012年付梓印刷，这些文章和书收录了很多老北大的往事和他与先师马寅初、闻一多、胡适、吴晗、朱自清、沈从文、周

炳琳、马叙伦、陈岱孙、赵迺抃、陈振汉等名人学习、交往的经历。融情于事，于平淡中见世事波澜，为张友仁赢得了“北大传记作家”的美誉。

提及离休后一刻不得闲的生活，他一笑：“闲着是不能颐养天年的，颐养天年得有工作，得干工作。我是这么个思想，所以我要找事干。”



张友仁教授 2000 年摄于北京大学

谈起北大，张友仁感慨颇多。“我上学，上西南联大，也就是北大了，西南联大上了三年，后来回北京安排分配，个人填志愿可以到北大，可以到清华，可以到南开，我填的是到北大，也是因为喜欢北大的精神。”

建国初期马寅初校长经常到民主楼张友仁的办公室，与他促膝谈心。马寅初曾谈及北大的精神：“回忆母校自蔡

元培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做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

张友仁至今记得马寅初校长这一番话，“北大特点一直都是蔡元培校长提倡的兼容并包、百家争鸣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才能办好。这么多年来北大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北大的变化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么个原则，这个好的传统是主要的。”

当记者请张友仁为北大学子惠赠寄语的时候，这位与北大结缘七十多年的老先生欣然提笔，写下如下一段话：

愿北大同学，牢记
北大人之责任，进一步
建设祖国的脊梁和
唐书！

张友仁
2014年11月22日
于北京大学

这是一位老教师对年轻一代学子的谆谆善诱，也是北大前辈对后来者的深切期望。

【采访手记】早在正式采访之前，记者查阅了《张友仁：一腔热血报中华》《珍贵的回忆——张友仁教授访谈录》及《难忘的大学生时期——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等，张老师丰富的人生故事引起我浓厚的兴趣。

采访那天，九十多岁的张老师精神矍铄，非常健谈，谈起在西南联大的往事时恍如昨日。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沈从文、闻一多、吴晗，这些只有在教科书中才能见到的人物在张老师的讲述中活了起来。记者真切地触摸到了那段封尘的往事，透过硝烟看到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前辈大师，看到了几经风雨、岿然不动的北大，看到了在各个时期引风气之先的北大人。能听到这些是幸运的，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正如老先生所愿，北大精神当永存，

这是对大学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每念及此，我辈应更当发奋，守住精神家园，有所作为！

【人物简介】张友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黄岩人。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经济系助教。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为政治经济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曾到加拿大、荷兰、德国、丹麦、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大学访问和讲学。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唐丽丽：医学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

癌症是全世界首要的死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如不进行干预，2005年至2015年期间将有8400万人死于癌症。

美国癌症医师悉达多·穆克吉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众病之王：癌症传》中写道：“一个希腊语词汇和癌症

的历史发生了交汇，那就是‘onkos’——人们有时用这个词来描述肿瘤；现代肿瘤学的用语‘oncology’正是脱胎于此字。‘Onkos’在希腊语中表示一种分量或负载，或者更通常地表示为一种负担——癌症被设想为身体上承载的一种负担。在希腊的舞台上，‘onkos’这个

词还被用来描述一种悲剧角色的面具，这种角色的头上往往戴着一个笨重的锥状物，象征着其所承载的心理负担。”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类而言，癌症并不仅仅意味着躯体的痛苦，更意味着心灵的重负。

在人类与癌症抗争的历史中，逐渐产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心理社会肿瘤学”，主要研究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在疾病发展的各阶段所承受的压力和他们所出现的心理反应，以及导致癌症发生和促进癌症痊愈的心理、社会、行为因素。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唐丽丽教授致力于癌症康复的临床工作和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研究，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她用自己的经验和学术成果，不断地向人们证明：医学不只是装进试管里的各种实验，医学也并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更是一种“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唐丽丽教授

走近医学心理学：从兴趣到责任

唐丽丽是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的医生。本科在内蒙古医科大学就读时，她遇到了一位将她领进了医学心理学兴趣之门的老师——金炜。尽管当时医学心理学等人文医学的研究和教学并不受人关注，金炜却充满了信心，每次授课都热情洋溢、神采飞扬，将知识和人文关怀共同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受金老师的影响，唐丽丽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患者心理、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的相关研究中。研究生阶段，她参与了一个白血病患者行为特征、情绪反应和人格变化的课题研究。这次研究经历不仅使唐丽丽的医学心理学研究与肿瘤学建立了联系，也促使她从研究兴

趣深化到了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在收集病例的过程中，她目睹了大量年轻患者遭受巨大的痛苦却得不到有效的心理救助和康复指导，心灵被深深触动，立志深入学习和研究能够为患者提供心理救治的科学。

1996年，唐丽丽进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个在专科肿瘤医院建立的心理社会咨询服务专科。唐丽丽是当时科里唯一的一个“科班出身”，迅速成为了科研和临床实践的中坚力量，参与了康复科的多项改革。从消除患者的“病耻感”、鼓励他们与家属共同走进康复科，到采用心理痛苦温度计（Distress Thermometer）等快速筛查工具对患者进行心理社会痛苦评估，从撰写专业的心理肿瘤学教材、培养专业人才，到推动康复科成为独立挂号、独立诊疗的门诊，唐丽丽付出了大量心血，见证了康复科规模的扩大和专业性的逐步提升。

为了更好地为发展中的心理社会肿瘤学服务，2012年，唐丽丽与同事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与书籍的基础上，融入本土社会文化的特点，编写了一本中国自己的《心理社会肿瘤学》教材。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专门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指出在

癌症研究中“从只关注疾病到开始关注患者本身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并满怀希望地写道：“我对我们朝气蓬勃的年轻团队充满信心，对这个学科的未来充满希望。在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格局下，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结导致医疗卫生行业整体被质疑，将心理社会领域的内容整合到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护理当中已成为医学发展的必然，如何为患者提供更人文的关怀和治疗是肿瘤界医务工作者的重大课题。”

心理社会肿瘤学：美国的经验

在肿瘤医院工作的过程中，唐丽丽感觉到，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先进经验。2005年，唐丽丽赴美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源地、相关研究的巅峰——纽约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进修，初到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970年代之前的美国，癌症诊断和治疗并不发达，癌症患者的心理感受更是鲜少受到关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签署了“向癌症宣战”的国家计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机构（NCI）获得了651亿美元的巨额科研经费，美国的癌症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

癌症的认识也日趋全面，逐渐认识到癌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在病理、化学和生物因素之外，开始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在癌症发病和治疗过程中的作用。

1977年，心理肿瘤学家吉米·霍兰（Jimmie C Holland）在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成立了一个小型的精神科，开始对癌症患者的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并发症进行观察、调查和干预，成为美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轫之地。经过3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从日光暴露与癌症预防、化疗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神经精神副作用到儿童肿瘤患者及其家长的心理问题都有专门的研究，可谓包罗万象。治疗的手段也非常丰富，包括个体心理治疗、集体心理治疗、夫妻心理治疗、家庭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冥想、艺术治疗、心理教育性干预、危机干预、精神急症的处理、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等。

为了更好地从美国“取经”，唐丽丽找到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第一人”吉米·霍兰，投入她的门下学习。霍兰教授为人谦和友善，也很关心中国癌症康复和心理肿瘤学的发展，对唐丽丽进行了悉心的指导和帮助，并授权唐丽丽翻译

了她的几本重要著作。她们的师友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唐丽丽的邀请下，吉米·霍兰多次来到中国讲学，为中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癌症“人性”的一面

唐丽丽编写、翻译了大量关于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专著，其中翻译自吉米·霍兰的《癌症人性的一面》用亲切、通俗的语言，系统介绍了心理社会肿瘤学所关注和践行的理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癌症“人性”的一面，直接挑战了人们对癌症的传统印象，转而为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古老的恶性疾病及其患者。

癌症“人性”的一面首先将视线转向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唐丽丽说，每一个人都有三部病史——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而非只是躯体的。这种叙事医学的视角，还原了一个完整的、有着多面复杂人性的人。对于不同的人，也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吉米·霍兰在书中形象而风趣地说：“应该对每个人自己的应对方式表示尊重和支持。对一些人说，想象自己是骑着白色骏马与癌症战斗的勇士是很

棒的；但对一个安静和内向的人来说却可能是灾难和额外的负担。”

同时，“人性”的一面也体现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上。正如特鲁多医生的那句名言：“医生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癌症患者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痛苦，害怕死亡、疼痛、丧失功能，也充满着对家庭和未来的担忧。肿瘤医生更应更多地倾听、安慰，了解患者的心理感受，而不是把他们视为一个个“喘气的瘤子”。唐丽丽用“鱼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说，我能看到你的眼泪，因为我在你心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医患沟通的真谛——只有把患者放在心中，才能真正帮助他们。

在翻译这部西方经典专著的过程中，唐丽丽还特别注意引入本土化的经验，缩减原著中对宗教、西方医疗政策法规的阐述，更多地使用中国百姓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撰写。针对中国癌症患者受家庭影响较大的特点，还特别强调了与家属有关的内容。

“姑息”是另一种积极

目前，心理社会肿瘤学所倡导的癌症康复手段多种多样，以唐丽丽所在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为例，已经囊

括了心理门诊、睡眠门诊、疼痛门诊、中医康复门诊、理疗按摩门诊等多个专门化的治疗单位，改善患者在癌症诊断及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症状，如疼痛、失眠、呕吐、厌食、焦虑、抑郁、谵妄等，并为患者及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及治疗，同时为失眠的患者开展生物反馈治疗、冥想、安思定睡眠仪等疗法，并为癌症患者的康复开展中医、理疗、按摩等治疗。

其中的很多治疗手段都可以被概括为“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在中国人看来，“姑息”是一个消极的字眼。但在癌症的治疗与康复中，“姑息”是另一种积极。唐丽丽介绍，“姑息”疗法发端于英国，在引入中国大陆时译成了“姑息”，而在港台地区，则多用“宁养治疗”、“舒缓疗法”来称呼这种疗法。姑息治疗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和治疗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躯体的、社会心理和宗教的干扰，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从而改善面临生命威胁的患者和他们的亲人的生命质量。

肿瘤医院康复科开展的另一项富有特色的治疗方式是冥想疗法。“冥想”疗法是一种想象性心理治疗方法，通过观想一个对象，使人心智专注，并通过

积极的想象将健康开放的意识注入到人们的精神中去。这种疗法凝聚了很多东方独有的智慧。唐丽丽说，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看，“冥想”疗法是大脑与内分泌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她特别指出，现代人生活在一种浮躁的心态之下，被焦虑等情绪控制，往往无法了解自己躯体的实际情况。癌症患者更是被各种负面情绪所左右。通过冥想可以达到深度的放松，有助于改善焦虑、失眠等一系列症状。“正所谓‘静心才能养身’。”唐丽丽说。

2010年，唐丽丽与康复科的同仁们一起，推出了原创音像制品《冥想》，将理论与实际结合、音乐、画面与专业人员的示范相结合，帮助患者轻松练习，一经发行就广受好评，并在肿瘤医院康复科门诊为500多人次的患者进行了冥想治疗。这套冥想疗法还作为一项行为干预技术应用在集体心理干预的研究中。

星星之火 必将燎原

除了出门诊、做科研、参加学术会议和培养研究生，唐丽丽还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宣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门关注肿瘤患者提高生活质量的科学能够为更多公众了

解和接受，也希望推动政府在立法与管理层面重视癌症患者的心理康复。除了《癌症人性的一面》、《冥想》之外，她还撰写了《肿瘤患者身心重塑与功能锻炼：康复是人生的新起点》，成为国内第一部心理社会肿瘤学原创科普背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文化背景，更贴近中国癌症患者及家属的实际情况。此外，她还先后在《癌症康复》、《心理与健康》、《医学科普》、《健康报》、《医学论坛报》、《健康时报》、《北京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科普文章几十篇。多次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采访和邀请，做客《健康之路》、《养生堂》等栏目，讲解癌症心理康复知识。每年2月4日“世界癌症日”，唐丽丽及同事们也会参与各类宣传活动。

作为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主委，唐丽丽还致力于心理社会肿瘤学在大陆地区的推广。目前，相关的专业协会已经在西至新疆、南至广西的范围内逐步建立。她专门制作了一幅“全国分布图”，每增加一个省份就划上一个红圈，“‘红圈’在不断增加，但还远远不够。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推广和

宣传，这项事业一定能够在更多的地方生根开花。”

唐丽丽把心理社会肿瘤学这门非常年轻的学科比喻为一株嫩芽，她希望社会各方的力量共同呵护它的成长。“在中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医患沟通方式还是对死亡的理解，都使癌症的心理康复在患者中的接受度较低；同时，我国的人口与经济条件，在资源上也限制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的推广。”，唐丽丽说，“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重视与推广，推进癌症心理康复事业，

真正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推进我国的防癌抗癌事业。”

最后，她引用台湾姑息医学之父赖允亮的一段话，送给肿瘤患者、他们的家属以及所有关心癌症心理康复的人：

“如果想象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你会发现这绝不仅仅只靠奶粉和水，更需要的是爱。癌症的康复过程也是一样。”

这也正印证了那句话——医学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对人身体和心灵的全面关注。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素馨

学者谈读书

从认真读好一卷书开始做起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读书人成长成才的必经之路。万里征程，要一步一步地走；万卷好书，也要一卷一卷地读。读，甚至读破万卷书，谈何容易？究竟该从何处入手，得其门而入，应该是困扰许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此问题，我曾专门向张积师请教，恩师叮嘱：做学问要重基础，从经典入手，尤其得读懂弄通一本最为经典的著作，作为自己读书治学的“看家书”，是很多著名学者的共通之路。后来读书，了解到高亨先生也提倡并坚持“一经通，百经毕”的“一通百通”之法。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曾选定《韩非子》一书作为主攻的对象，朝夕研读。《韩非子》作为他的“看家书”，成了他研究周秦典籍的起点，从此出发，他读通了一系列经典名著，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最终成为一代学术名家。

如今年龄渐长，读书愈多，愈觉“看家书”的重要性和“一通百通”读书法的必要性。我的理解，这样的“看家书”，

就好比干革命创事业的根据地，有此作为牢固的根基，就会心中不慌，越走越稳，越走路越长。胸中是否有“看家书”，是决定以后学问格局和气象的关键因素。由此体会到，读书要着眼于读遍乃至读破万卷，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则要“卑之，无甚高论”，从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读好一本书做起。

究竟该如何把一卷书读好呢？结合恩师的教诲和自己的经验，我想至少得经过四个阶段：

一是读完。选定一本书后，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从头到尾，完完整整，一字不落地将其读完。这难道不是很容易么？看似容易，实则未必。我上课时，经常向同学们提两个问题：一是从小到大，有哪位同学曾彻头彻尾通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本？二是每年寒暑假回家，大家都有带好几本书回家的习惯，但收假归来，有哪位同学曾彻头彻尾地读完其中的一本？满堂少年中，有肯定答案的总是寥寥无几。在我们个人

的阅读生活中，随便翻翻浅尝辄止，刚开个头就另觅他书的情况也会经常发生，这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读法，作为消遣是可以的，但是要靠这样的路子研究学问、提高水平，恐怕很难有成绩。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对于随随便便翻阅读书、点读数篇中途而废的读书方法很不赞同，讥讽其为“杀头书”。他读书治学讲究“扎硬寨，打死仗”，主张“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他自己读书，从来都是正襟危坐，将选定之书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评注圈点，从不读“杀头书”。

二是读熟。在读完一书的基础上，要反复读，以至精熟，在精熟之后，还要定期拿出来重读，“温故而知新”。熟能生巧，用在读书上，也是对的。虽然读过或者读完一书，但对其语言、观点、内容、风格不能熟稔于心，时间长了，终会成为过眼烟云，了无痕迹。读书不熟，终是无济。就像仅有一面之雅的朋友和朝夕过从的朋友，其亲密程度根本无法相比。朱光潜先生就讲过，读书“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

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如此花大力气读一本书，其过程中，精彩之处，该动笔头子抄的就要一字不苟地抄，该动嘴皮子的就要一字不拉地诵读，该动脑子的时候就要整段甚至整篇地背诵。我上高中时，语文老师曾对我讲，学习语言文学，除了听、说、读、写四门基本功以外，还得有个“背”的基本功，古人摇头晃脑背书的习惯，并非一无是处。我看这真是正确的经验之谈。

三是读透。读完了、读熟了并不意味着就真正读懂弄通、读透彻了。精熟一书后，还要做到读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关键在一“破”字，也即掌握书中精蕴，勘透书中玄机，真正能够过书面文字，理解作者的观点、意图，悟出书中的微言大义和弦外之音，了解全书的体例结构和研究方法，并能知其优劣，有所评述。甚至能设身处地，与作者感同身受，引发持久而深刻的共鸣。如读《红楼梦》，没有“一把心酸泪，满纸荒唐言”的切肤之痛和悲凉之感，即便读得再熟，恐怕也不能算是读透了这本名著。古人云：“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

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读此三文而至动情堕泪，其前提也一定是读透读破。

四是读活。读书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是古人十分宝贵的读书经验与教训。虽然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读懂弄通一本书，但却深陷其中，为书所役，死在书下，成为只会掉书袋的“两脚书厨”和不通事务的“书呆子”，于己于人，是为迂，于社会于公务，则为害。清人钱泳云：“为官者必用读书人，以其有体有用也。然断不可用书呆子，凡人一呆而万事隳矣。”原因就是前者把书读活读灵了，后者则把书读僵读滞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陷阱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我为主，书为我用，达到“六经注我”的最高境界。在理论方面，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守正创新，提出新知新解，甚至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方面，则要活学活用，学以致用，而且能够用好用对，将书中的理论、方法、观点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结合实际情况，指导和推动工作的科学发展。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善于把

书读活的优秀典范。

如此看来，读好一卷书也绝非易事，需要有大智慧，下大力气才能做到。在平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选择一本自己喜欢的经典之作，认认真真、老实地读下去，读完、读熟、读透、读活，必定会为“读破万卷”打好坚实的基础。即便不为治学计，为了寻求生活中的乐趣，有一本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知心好书”，也未尝不好。“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种读书境界，是值得每一位读书人努力追寻的优雅生活。

当然，强调认真读好一卷书，并非整日整月整年甚至数十年只守定一本书，而不知博观泛览其他书籍。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在“一年读十书”的浅读、泛读、快读的同时，养成并坚持“十年读一书”的深读、精读、慢读的习惯，二者相辅而行，假以时日，必有大益。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2014年10月21日

第4版；《中国研究生》，2014年第4期

作者：杨虎

且愚斋读书札记十则

小序：且愚斋主人读书之暇，偶有所会，撰成读书札记十则，以论读书之法。读书之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文中所论，均为一己之得。或有同气相求者，或有不以为然者，或有不置可否者，若能切磋指正一二，则不胜欣然。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之乐正在其间。草此小序之际，忽忆明人于谦《观书有感》一诗，亲切有味，道尽千古读书人之胸怀。兹转录如下：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是为序。

一、读书与力行

读书之目的无他，治学明理与修身明德耳。治学明理者，学问之事也；修身明德者，为人之事也。治学者，心知肚明，口能详说，便是佳境；为人则需身体力行，日慎一日，方可做一道地学人。此二者，皆从读书中来。读书明一事，知一理，若认同此理，则当认真履

行之。所谓言行一致，论道与实践一体也。若口谈高尚之论，而行不义之事，言行相悖，则于人于己又有何益？读书终究是书本之事，若不能履行之，纵读尽天下典籍，识遍世间事理，亦是枉费！惜乎自古而今，学术一流而人品卑下者在在皆是，岂不可悲也欤？古云：“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诚哉斯言！

二、首明目录之学

盖为学之法，一在求学问道于大师名家；二在往来切磋于同窗之间；三在广阅前贤时人之著述。欲学有根底，则读书之事尤其重要。读书欲得其门而入，当首明目录之学。目录者，初学者无言之师也。目录之学可使初学者明学术源流，辨以往学术成绩之得失优劣，然后知治学门径。循此以进，方可登堂入室，以成学问之大。清人王鸣盛曾言：“凡读书最紧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诚可谓指点迷津之言也。

三、泛览与专精

俗云“博大精深”四字，乃读书、

治学、为人之极致也。中人以下，博大者不能精深，精深者难得博大。然则广博与精深，各有其用。千头百绪，“由博返约”之法则为千古不刊之论。孟子尝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适之先生训导后生，常言“先打游击后攻城”之法，可谓深得其中三昧。盖初学者贵博学，兼收博览，不厌其多。正所谓：“泰山之高，以其不拒小壤；江河之大，以其不择细流。”胸怀不广，视野不宽，怎知天地之大，学问之深？学有根基者，则当于泛览流观之余，择一二专题作精深之研究。正所谓“经营自家一亩三分地，当精益求精”，如此方可有所建树。以作文为例，其法则有二：搜集资料应“竭泽而渔”，此博览之功也；选题则应“具体而微”，此专精之术也。盖不如此，则四面出击，处处泛论，发人之所发，则毫无价值可言，徒然贻笑大方。若能精于一二专题，则可做窄而深之研究，往往可于前人止步处作深入之探讨，如此，则可发前人未发之宏论。此等文章，多一篇则有一篇之用。

四、熟读经典与原著

读书当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由浅

入深，方能一睹学问佳处，此人所共知之理也。唯由浅入深之法则众说纷纭，体悟不一。吾之法无他，但熟读经典原著耳。学问梗概可于概论或书目中求得，而欲有真切之体会，识得庐山真面目，必须精读经典原著。否则只是隔靴搔痒，难得其中真谛。如精读徐宝璜《新闻学》一册书，胜读今人《新闻学概论》之类书籍若干种，此经典魅力之所在也。中文经典尚且如此，翻译之作尤当循此而进。方今译界，虚浮之气云山雾里，遂使千万译作鱼龙混杂，难辨优劣。慎重选择已成读译作之第一要务，选择不甚，开卷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为免此害，不若精读原著，虽或费时，然终究原汁原味，真切有味，正所谓向上一路，不入歧途是也。

五、温故与知新并举

学人读书之道，一在温故，二在知新。温故以睹前贤，知新以晓今情。二者相辅而行，岂可厚此而薄彼？温故不知新，则不免固守一隅，怎观井外之天？知新不温故，则流于浮泛浅薄，难得前人精髓。温故多旧籍，知新多新著。旧籍贵精读暗诵，新著当博览多识。精读暗诵以求学有根底，博览多识以求广拓

视野。学有根底则可左右逢源，侃侃而谈；广拓视野则可旁征博引，发为宏论。前者为自得立身之学，后者为交友泛论之术。舍此二者，则难有大境界之学。

六、中西比较印证

导师尝训导诸生曰“读书为文当前挂后靠，左顾右盼，打成一片”，余深然之。恪守至今，受益无穷。前挂后靠者，古今贯通也；左顾右盼者，中西印证也；打成一片者，融会贯通也。此乃大境界之学也，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古今贯通之意，已于“温故与知新”条明之，今再言中西印证。

中学、西学，本无高下优劣之分。王国维有论断曰：“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此言真可发今人之深省。中学与西学，二者各成体系，虽有隔阂，必有连贯。若一味固守国粹，动辄言秦汉，则实难融入今日之学界，且难有创新之论。若一意奢谈西籍，言必称希腊，则终归贩卖学问一途，所学所论于国事何益？更有甚者，以为如此可高人一等，

则其情尤其可恶。为今之要务，当厚此而不薄彼，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以读书论，则须平心静气，既观西人之论，又查国人之言，参错比较，方出己论。往昔学者之所以能成大气象大境界之学，其诀窍在此！

七、多读与勤写

天道酬勤，万事皆然。为学之要，多读与勤写耳！

颜之推言：“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宗羲言：“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博览群书之必要，于此可见。读书并无捷径可言，唯有“博综兼览”四字。一意读去，入眼既多，自有收获。但若只读他人之书，而无个人思考，则成毫无见解之两脚书橱也。章学诚评清儒“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正中书橱之膏肓也。

前人多言，学与思当相辅而行，读书亦然。学，即为读他人之书；思，即为发自我之论。发挥自我之论，方法有三：一为随文批注；二为读书札记；三为成型论文。如此积少成多，假以时日，自然会收蓦然回首之效。是故，读书要勤，而笔头之功亦不可废。埋头苦读而

忘却自我，笔耕不辍却不知读书，均非明智之举。

八、抄书之用

欲明华夏民族固有之思想学术，则当择儒、道、法、兵、佛诸家经典时时翻阅。欲得其门而入，则可于浏览之外，择其精要者手抄一遍，以求能暗诵于心。翻阅浏览者，眼学也；手抄记诵者，心学也。若论求学之法，则二者当交替采纳；若论体悟受益之深，则二者之别不可以道里计。俗云：“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此乃读古今中外经典之二法门也。

九、当具同情之理解心

陈寅恪曾云，今人对古人之学说，当有“同情的理解”之心，方可论说古人之学。清儒钱大昕亦教导后生于未明古人学说真谛之前，切不可动辄苛责古人，以一己之见凌驾于古人之上。此说甚是。读书若先有主观之见，则不能平心静气体悟前人学问真味。发为议论，或不免离题万里，所论与古人之心相去甚远。谬种流播，混淆视听，贻害不浅。朱熹云：“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

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术，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千载而下，能脱朱氏所论读书之弊者，寥若晨星。今之学者犹然！余谓我辈读书人，不惟对古人当有同情之理解心，对古往今来之一切学说，其苟能于学理上成一家之言，均应抱此等襟怀。切不可执一己之论，高自标榜，视他人之学为糟糠。进而言之，论学当如此，为人处事亦当秉此论而行。窃以为此义与孑民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思想略通一二。

十、当有往来切磋

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读书亦同此理。千万人读《孟子》，或有千万种之孟子学说，其中或有千万种真知灼见，高于自家见识者，正不知凡几。若拘于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不知转益多师，往来切磋，则万难有长足之进步。王夫之有言曰“耳限于所闻，则夺其天聪；目限于所见，则夺其天明”，其中弊端，不言自明。是故，则当摒弃门户之见，不断与他人切磋论说，学习者可有之，批驳者可有之，辩难者可有之。王充《论衡》言：“两刃

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此间正不知有几多主张，若能兼听并采，则收益之大不言而喻。要之，与他人交流论说，一则以广识见，二则以定是非，三则以交学友。有此三益，则何乐而不为？往昔游学之风甚盛，学者正藉此以观学问之大。我辈生于今日，于读书之

余，正当大兴往来切磋之风。此余深望于同辈时贤者也！

——时在零四年初冬，
且愚斋主人于京西中关村

来源：博客网

好文共赏

陶行知和他的“平民教育”

张友仁先生已年逾九十高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老教授。他 1943 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就学，1947 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在先生执教的半个多世纪中，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更“以淡泊名利、奋斗不息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几代北大学子”（朱善璐书记给张友仁教授九十华诞的贺信中语）。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影响深远。毛泽东赞扬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946 年 7 月 25 日，陶行知告别了他“爱得深沉”的土地，长长的送行队伍，悲伤欲绝，他的学生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所“朝也盼来暮也等”的竟是校长的灵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其最好的写照。世间已无陶行知，平民教育耀千秋。提到教育，就不能不提到陶行知，因为我们需要，不仅过去、现在；将来也同样需要。陶行知关注平民，关注乡村，关注劳苦大众，一个中

心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这在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中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一. 晓庄师范：从“一个天亮的地方”出发

“小庄”改为“晓庄”，一字之差，南京城外的这块荒郊野地由此成了“天亮的地方”。1927 年 3 月 15 日，迎来了“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是年陶行知刚刚 36 岁。一年前，他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他坚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教育救国”之路。上溯到三年前，他在内心深处，怀着无限失意，告别了 1919 年以来的“新教育”运动，转而致力于平民及乡村教育。他脱下西装，换上布衣草鞋，而且住到了牛棚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祖国，进而找到真正贴近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也开始了深入“国情”的教育改革行动。而此时胡适等人依旧在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大城市”里，以各种“风光”的革新

行动追求“再造中国”的伟业。在此背景下，陶行知贴近“国情”的选择倒显得不入“主流”，有些“另类”。

然而，陶行知并不计较这些。他的心里早已装满了数亿在黑暗中挣扎的苦难同胞，只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间让文明的曙光照遍中国大地。这似乎有渊源可查。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被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而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可视为“程门立雪”的另一版本。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晓庄”不远处的“老山”同样也被陶行知改成了“劳山”，“晓庄”与“劳山”合在一起，显示出陶行知要用“劳动”和他的“师范学校”来培养

真正能将贫困无知的乡村改造好的教师。陶行知说得很清楚，他的学校不收“少爷、小姐”，也不要“文凭和书呆子”。一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来，但也足以令校长陶行知欣慰。他们和校长一起，面对贫困，毫无退缩。他们依靠“一双手”和“一把锄头”，自己“建校舍，盖礼堂，开荒种地”，解决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所需。陶行知觉得，在贫困的乡村经历此番锻炼，培养出来的教师才会对农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适应贫困的农村又能以知识来改造农村的“导师”，所以“劳动创造的生活”成了晓庄师范“每天的课程”。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这首近乎大白话的“锄头歌舞”，不仅饱含着晓庄师生的生命体验，更是象征晓庄精神的“文化图腾”。晓庄师生都知道，他们的校长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学得好一点，连母亲大寿时收到的贺礼都典当出去了。陶行知对母亲说，他是代表晓庄师生为慈母献了一份最重的寿礼，希望慈母和祖国一样健康长寿。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晓庄师范到第二年，学子数量扩大了十几倍，且多是慕名而来，他们皆被校长陶行知打动了，虽然陶行知其实连张文凭都不能颁给他们。冯玉

祥将军也被陶行知打动了，他邀请陶行知前往河南考察，除了将晓庄师范视为“乡村师范教育的模范”之外，还要陶行知留下来担任河南教育厅长。但陶行知的心终归属于晓庄师生：“培养 100 万个教师，改造 100 万个乡村”，都要从自己倾尽一切的晓庄师范开始。

如同苏霍姆林斯基帕什雷夫中学一样，这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以致蒋介石想封竟无处贴封条。其后，陶行知辗转上海、流亡曾经留学的美国。但如《护校宣言》所写的：“晓庄的门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笔，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陶行知流亡到了上海郊区，在那里，陶行知办起了“工学团”，又发明了“小先生制”，带领他所遇到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流浪儿童，通过“做工”、“学习”、“团结”，在实现自救的基础上，为苦难的国家承担民族“新生”的责任。全国的仁人志士皆支持陶行知的“工学团”，远在延安主持“扫盲”工作的徐特立还大赞“小先生制”，并将“师陶”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在流亡国外期间，陶行知的所作所为亦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他四处演讲，足迹遍布整个北美，可谓不遗余力地揭露日军的侵略意图与野蛮行径，为祖国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理解与

支援，因为他的心始终在祖国的苦难同胞那里。

抗战期间，举家流落到重庆的陶行知决定创办“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纷纷迁回原地，陶行知也决定到上海去，一来可以为育才学校筹来更多善款，二来又能实现另一大理想——办“社会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把整个上海变成学校，让上海所有劳苦大众都可以接受教育。但时局演变很快再度将中国推入苦难，违背民意的蒋介石政权准备发起内战，陶行知作为知识界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不得不走上“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斗争的最前沿。1946年7月，李公朴被特务暗杀，接着是闻一多。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二. 为着什么人：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

为着什么人教育是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这是任何研究教育问题的人不能不首先研究和不能不首先解决的问

题。2006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说：“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素质。我们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巩固和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格局。今后，我们要使这三个方面都有所进步。”温家宝总理还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问题，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质。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1917年陶行知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推行推广“平民教育”，其精髓便是“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1923年8月，更是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为“平民教育”运动积极提倡，四处奔走。事实上，在从美国归来的那一刻起，陶行知就立下了“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宏愿，明确提出“平等教育”的概念。几年来，陶行知以主要精力实践它。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

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绝非易事，它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为之奋斗。”“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100万资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3年6月，陶行知与同是从美国学成归国，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亲自编写《平民千字课》的教材来代替《三字经》、《百家姓》等旧式识字课本，因为此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平民教育“可以推定国家命运”，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在南京、安庆、北京、南昌等地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足迹，他在那里创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夜校。陶行知还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贫困的农村，他鼓励暑期留校的同学们每晚教邻近的平民识字，把文化知识普及给劳苦大众。其实，这普及大众教育是陶行知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如他所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换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

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因为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强，靠小众，靠精英是不行的了，只能靠大众，只能发展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最终要进行大众教育！”

这些话是上个世纪说的了，时值 21 世纪的今天，听起来仍振聋发聩，仿佛不很久远，也就是昨天。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教育面向平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面向最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平民教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义务教育法》、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文件中提出，基础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族的素质”，“提高国民素质”。“素质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搞素质教育首先要有一个普及教育”、“要淡化选拔意识”、“要做一个园丁，培育好每一朵花。”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每个学生、每个教育对象都应无一例外地要受到良好的教育，那种只把眼睛盯在尖子生、录取率、得奖数等等的做法和思想，既与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大相径庭，也与陶行

知教育思想风马牛不相及。

三. 教什么：“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师从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本来“生活教育”这一概念是老师杜威率先提出来的，但陶行知却一反老师“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变之为“生活即教育”。个中之缘由，陶行知解释过多次。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又说：“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是教育的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教育，过乱七八糟的生活，便是受乱七八糟的教育。”“教育可以是书本的，是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

《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写于 1934 年，其目的便是为了廓清人们认识上的迷雾。陶行知把传统

教育与生活教育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首先，它教学生吃自己——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不许提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下来，等于一个吸了烟的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在加上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也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其次，教学生吃别人——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就是发农民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民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民、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民工人不够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

而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其一，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学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对杀人的种

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其二，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在《新时代的学生》一文中，陶行知说：“旧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这在今天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素质教育实施几年来，可以说是“轰轰烈烈”，而另一面“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与我们解决当前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能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必须了解生活，了解学生生活现状、了解生活发展的趋势、生活对人的要求的变化。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是全面发展、品学兼优、视野开阔、生理心理健康的人。实施素质教育，小而言之，为学生的终身受益负责，为学生的将来负责；大而言之，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为中华的腾飞打基础。

四. 怎么教：“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这个名字是陶行知最后才改定的名字；他曾用“知行”。把“知行”易为“行知”，如同“教育即生活”变为“生活即教育”一样，虽还是那几个字，只是前后倒了个颠，内涵却“天翻地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对实践的重视可见一斑。

还是在1917年，陶行知回国目睹了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中国教育有改革之必要，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陶先生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南京高校受此影响一律改为教学法。两年后，教学做的理论成立，最终确定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教学做合一”成为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这是陶行知杰出的创造。粗略比较一下“教授法”和“教学法”，就可见不同来。“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首先是由教书，到教学生，再到教学生学，用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贯彻在实践中去。

陶行知特别重视学生对知识的运用。“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就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

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

“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陶行知以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教学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做”的内容特点及教的规律、学的规律来决定，根据“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可灵活处理。

陶行知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名言：“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在具体教学中，“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得到真

正的教育。”今日读之，能不让只顾“灌输”，“冷眼”面向所谓“差生”的老师汗颜？这些话对我们当下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的改革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五. 结语

作为一个“海归”，一个洋博士，却眼睛向下，面向平民，面向农村，陶行知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斯人已去，精神长存。更重要的，陶行知不但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同时还是坚定的民主战士和大众诗人。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和民族民主革命

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学习陶行知，纪念陶行知，就要把他的这种精神、思想发扬传承下去，沿着他所开创的“平民教育”道路继续前进，让“平民教育”在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土壤上，开出绚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来源：微信号 燕南园爱思想

作者：高殿杰

史苑钩沉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2004年，我们将在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故乡聊城，纪念20世纪我国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先生。

五四运动时，傅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他那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蔚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该刊的刊名外文做Renaissance（文艺复兴），正好象征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它正式揭开了我国由传统从此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序幕，其历史意义恰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五四”以后，傅斯年先生去德国留学，受到当时仍处于兰克学派强大影响之下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以史料翔实、考订精赅为其特色。回国后，傅斯年先生在北大任教，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这条路线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不过，傅先生的本意似乎并非就是历史学止步

于史料，而是主张历史学应该由史料出发，也就是说，没有材料就谈不到历史研究。这和他的老师和终生挚友胡适先生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一脉相通的。后来，而尤其是解放后，它为我国广大的历史学界所垢病，这是众所周知的。无待赘述：他一系列的主要名文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声誉和地位。是以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前身，第一任院长为蔡元培）成立后，即由傅先生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学与语言学合在一起，亦足以见傅先生学术路线与德国学派的渊源。史语所原设在北京（北平），后迁至南京，同时傅先生仍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据已故谢国桢先生语我，当时南方的史学界大多出自柳贻徵先生的门墙，与傅先生渊源不深，所以傅先生特别介绍谢先生去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不意谢先生去南京后与柳门的弟子们关系很融洽，似乎颇有负于傅先生的重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岁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政府迁到重庆后，傅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曾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大炮”的声誉，为一时物望所归。但先生的主要职务仍然是史语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史语所在四川重庆，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因为躲避敌人轰炸，文科研究所疏散至乡间岗头村，副所长是郑天挺先生。当时有一个流传的笑话是说：每当有人来文研所访问，守门的那位老司阍就一定会问：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接着就解释说：正所长是傅（副）所长，副所长是郑（正）所长；当时傅先生已不授课，也极少向同学做讲演。我只记得有一次他向同学做的公开讲演，主席似是梅贻琦校长，地点在大图书馆前的草坪前，时间是1940年初，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不久。他那次讲的内容就是汪精卫何以叛国投敌。出乎我们听众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做一番政治分析，而是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而且是一番弗洛伊德(Freud)式的心理分析。那次讲话的内容大意是：汪本人正值翩翩少年时，却被富婆陈璧君以金钱、权势和婚姻牢牢控制着，而且从此控制了他一生，因而造成了他心理上极大的扭曲。这种情结（complex 傅先生称之为“疙瘩”）

使汪终其一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形成了他极为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讲演的结束语就是傅先生笑着向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说：所以我奉劝你们将来千万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他那次讲话的主旨和结论。我想大多数同学是不认同的。像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权、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说的，而应该是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难道心理上的扭曲就一定要做汉奸卖国贼？然而这次讲话，今天回想起来确有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意义。那就是傅先生是第一个——至少就我所见，他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反叛者最后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是有野心的一面，但

也有其内心受迫而扭曲的一面。这就更深一层地触及到了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而比单纯地论述背景与客观形势要更深一步。弗洛伊德论达·芬奇，要追溯到他的恋母情结，尽管读者未必同意，但仍然不得不敬佩他那穷究极底的探索精神。我不知道傅先生的这次讲演是不是收入了他的《全集》，但作为一项先驱的首创，这种创新与探索的精神却是值得敬佩的。今后史学界也不宜故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为传统所固定下来的框架之中，而应该勇于探索新的路数和途径。一个人在行动时，到底心底里是怎么想的，是受什么情绪和动机所支配的。不然我们就不可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抗战后期，国内矛盾已日益突出，国民参政会遂组织了一次延安访问团，团员似是六位参政员。有傅斯年和黄炎培在内。在延安，毛泽东与访问团员逐一谈过话，与傅先生在五四时期当属旧识，大概也称道了傅先生在五四时期的功绩，所以傅先生就自称：我们当日不过是陈胜、吴广而已。同时大概还请毛泽东写了几个字。毛泽东随笔写了如下的信：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书唐人语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

孟真先生

毛泽东

不久，战争结束。北大校长蒋梦麟去重庆做官，校长由胡适继任。因胡适当时在美国，未能速返，在胡适回国以前，校长由傅先生代。是年十二月一日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对内战举行集会，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打死四人，造成惨案，由此爆发了“一二一”运动。傅先生遂由重庆来昆明处理学潮。他慰问学生，见到了学生代表时说，你们就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子女我不能答应。一时曾博得不少同学们的认同。但是傅先生当时的基本立足点却是无法认同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所以，不久他也和其他几位老师（如冯友兰先生、雷海宗先生等）一样和大多数同学的主流拉开了距离。

同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共商战后的建国方案。出席的各党派与无党派的代表共38人。傅先生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的身份也是代表之一。当时的美籍教授温德（R. Winter）就指着他的名字说：傅斯年，Another Kuo Min Tang（又一个国民党）。但北大复原回北平后，傅先生却对伪北大教授丝毫不假以颜色，一律解聘。傅先生认为：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气节的表率，为敌人服务的就不能为人师表。为此当然也免不了一些纠纷。胡适回国任校长后，傅先生回南京史语所，当时面临战局动荡、经济崩溃，傅先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再一次名动一时，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随即下台。

解放前夕，傅先生在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主要的班底仍是北大老人，如毛子水、姚从吾、刘崇、钱思亮各位先生，台大若干年来蔚为台湾的北大。傅先生还曾一再动员老友陈寅恪先生去台湾，不果。不久，傅先生即以高血压、心脏病在台湾去世。

综观傅先生的一生，青年时代的辉煌，不失为五四一代风云人物的代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主持中研院史语所

以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工作，其间功过得失也是有目共睹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的言行，是值得称道的。他晚年所选择的道路也并不足为异。本来天下大势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使是“五四”以后到“一二一”运动其中的那些精英人物不也是在时代的大潮汹涌之中不断地在分化、在改组吗？有的人继续向前，有的人隐退了，有的人转化到了进步的对立面。人总是与时俱进、与时俱变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原点上。借用章太炎的一个名词，不妨另赋之以新意，也可以叫做“俱分进化”吧。现在《胡适全集》、《傅斯年全集》都已经出版了。汉奸周作人的书，也在出版，而满洲国大汉奸罗振玉居然还被戴上了一顶爱国的桂冠。而当年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辉，又消失到哪里去了呢？谁又敢说，他们那些豪言壮语就是真诚的，而且会永放光芒呢？也许正如诗人歌德在《浮士德》序曲中所说的那样：一切眩人耳目，都只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惟有真正的精金美玉才为后世所宝。

来源：爱思想网站，原载《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何兆武

■ 大美北大

燕园花事 黄月季



古人云白马非马。要我说，黄月季亦非月季，不宜与其他月季混为一谈。

黄月季开在春末夏初，勺园往西门去的路旁，栽了很多。某年夏夜与朋友散步至此，只见半开的花盏在路灯下娇黄欲滴，用手机一拍，竟如夜光杯一般，满斟佳酿，呼人小酌。

饮罢这酒，走到湖边，北岸有人在树影里弹着吉他，我们一时挪不动脚，就势坐在湖边的石头上不远不近地听。

听久了，有人邀我们近前同唱，一首接一首的老歌，与路灯下的月季一样教人微醺。

那年夏天还看了许多其他的月季、玫瑰、蔷薇，多是在晚上。这些蔷薇科的正主一开，夏天的气息就变得浓郁起来。学校里的月季有许多其他的颜色，正红的、浅粉的、红黄渐变的，不一而足。



玫瑰却只得玫红一色，叶子和花都皱皱的，香气比月季浓郁不少，湖边栽了很多。蔷薇的花较小，某些品种喜攀援，燕南园里便有几搭；学一东门附近那棵重瓣白丁香对面，则有一丛白蔷薇，开得很早。



还是同朋友一起，看完剧星决赛出来，坐在大澡堂侧面的台阶上，就着晚

风吃完一牙刚从对面买来的西瓜。不想回寝，就趁着夜色在学校里乱逛，她光着脚，我提着她的红色高跟鞋。



走到佟园附近，一排粉月季开得正盛，我要拍，她拎过鞋，站在路灯下等我。一整个夏天，正经做过的事也不过如此了吧。

但最惊艳的还是黄月季。可惜那晚没有唱许巍的蓝莲花，不然，是一组绝妙的对仗。如今旧友难寻，昔年在湖边弹唱的人也早已面目模糊，只有黄月季如期地开了，人事易变，倒不及这无情的草木守约。去年我买了台微单，不再用手机拍花，但之前那种油润饱和的鲜黄，却怎么也拍不出来。



然而，今年的花自有今年的好处。明年再看，必定又是不同的情致，年年知与谁同？竟不必太执着，得尽此时之欢，便是好的。

来源：微信号 燕园每日话题

摄影：Yanz（文中照片均摄于北大校内）

学员心声

燕园抒怀

馨香四溢，芳泽盎然的5月依旧莞尔，我们102位PICC人从祖国各地齐聚北大。凭栏作笔意，只关燕园情。

走进北大，置身于历经百年风雨飘摇，依然竞朗勃发、濯涟不妖的燕园，只一瞬便坠入了未名湖碧波潋潋的眼眸深处——未名、博雅在默默地驻足，恰如我默默地驻足在这里：未名的是置于湖畔的情怀，而可以名状的则是对一塔湖图的赞叹。湖与塔一动一静，一个隽美一个深沉，一个颀澜一个若谷，相映生辉、盈盈脉脉。它们升华为了北大的灵魂“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更由于它们的交相辉映，使北大彰显着太学博而逸雅，秀而殷殷的气概。园内随处可见“通幽曲径路连路，桥架翠湖桥接桥”的景象。我不禁感叹，无数的北大人不正如这桥与路，擎引着百年来的莘莘学子在北大洗礼、在北大成长、在北大腾飞！而我们，不也正是因为站在了PICC这位巨人的身上，才取得了我们今天的成就吗？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是我们的共同愿景，而唯一持久的

竞争力就是不断的学习能力！成为一名北大学子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更是我的一份殊荣。而通过孜孜不倦努力实现思想的升腾，理念的飞跃，素质的提升，付诸PICC的培养于业绩则是我今后乃至将来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走进北大，在向往已久的北大学堂，我聆听着学贯中西、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学识广博、业务专精的总部领导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的人生智慧仿若涓涓细流浸润我的心田，恰似缕缕熏风漾过我的灵魂。

走进北大，在红楼前漫步，在朗润园凝神，我常常兀自的奢求时光能够倒流，期盼在时空的逆转中能把领袖膜拜，能与先哲对道，倾耳先贤们万马奔腾般的思潮……青苍素云，撷经论衡，竹香习习，猗欤休哉！

走进北大，在临湖轩的劲松翠柏之中蔡元培校长的半身铜像就坐落在此。松涛声中我悉闻“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在天际振聋发聩！北大的传统学风对推动中国近代历

史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著名活动家李大钊、毛泽东等最主要的领导人均出自北大。无论时空如何变幻，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北大人！而今天的北大人他们不甘寂寞、不耐平庸、在探索求真中诠释着永无终极的追求。这是一种天成的使命感，一种源自内心的虔诚，一种百年来积淀的自尊与自信！“自由独立，兼容并蓄”是北大的立校之本，也是北大精神最具权威的表述。尽管北大人开创的惊天动地的恢弘伟业已经镌刻了永不磨灭的印痕，但在北大我却没有体会到丝毫的桀骜与刚愎。大音希声，大象希形！在北大，可以体会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感受古典与现代的冲击、传统与改革的碰撞，更可以体会到对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盛，企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身为PICC人，永伫潮头，做市场的引领者我们责无旁贷；为社会承担责任，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我们冲锋在前！

蚁兽之力，纠其一心，虽非大业，亦足撼山！

走进北大，我与同样求知若渴的PICC学子一道，共同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70个日日夜夜。我们用专注和执着来到这里寻找国人思想的坐标，我们用赤诚和本真来收藏这座知识圣殿的文化精髓，我们用爱心和真诚在北大凝结了深厚的师生情、同学情。在这里，我们的智慧得到启迪，在这里，我们产生了永不言败的思想动力！冠带PICC的荣耀，求学北大，我愿穷付所学，竭尽己力，同各位同仁一道将北大求实、进步的精神带回去，爱司、兴司、强司，效正统之法，忘身于国家！！

作者：张力化

单位：人保财险辽宁省本溪市分公司

副总经理